

第二版前言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一些重要問題以及过去一年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發生的許多变化，使我有必要在新版时把一九五五年春天所做的这个报告作一些修改。但事实上不容許我等很長時間以后再徹底修改这个报告，所以原文的絕大部份只好保留下来。因此我只限于删除了原文中包含的錯誤論点，即过渡时期的階級斗争必然尖銳化的論点，在脚注中指出所引著作的最新版本。这样，这个报告的第二版就可以滿足一些迫切的要求。

弗·厄斯納

1956年7月31日 柏林

统一书号：4002·104

定 价： 0.26 元

目 录

第二版前言

过渡时期的必然性·····	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特点和阶段·····	1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概况和經濟規律 的作用·····	27
經濟和思想·····	85

过渡时期的必然性

德意志民族最伟大的儿子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论证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客观、历史的必然性。他们科学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完备形式决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产生，因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其中不可克服的障碍。

从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过渡到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时，新的经济形式都可能在旧的生产方式内部形成，而事实也是如此，因为这三种社会经济结构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它们三者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仅仅是人剥削人的形式有所不同，因此从经济上来看，一种结构可以从另一种结构中生长出来。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政权夺到资产阶级手里，使得政治统治形式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

从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是根本不同的。与资本主义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它不是以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而是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形式。这种经济形式在质上是全新的，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是對抗的，因此只有通过革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它才有發展的可能。

当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生产愈發展，就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創造了愈多的物質前提。同时这种發展也就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生产資料资本主义所有制日益成为束縛社会生产力發展的桎梏。社会經濟發展規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質的規律——日益迫切地要求解决这个矛盾，也就是取消生产資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有消灭这种占有形式，建立生产資料的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發展，剝削階級和人剝削人的現象才会消灭，然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階級对抗才会消失。

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包括一整个历史时代，我們把它叫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馬克思在對哥达綱領的批評意見中写道：

“在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横着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同这个时期和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則只能是無产階級的革命专政。”^①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必要前提就是要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階級政权，建立工人階級政权。只有夺取政权以后，工人階級才能使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質的規律發揮作用，才能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代替生产資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因此苏联出版的政治經濟学教科書中說：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三十一頁。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建成。”^①

工人阶级的政权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巩固联盟的基础上的。农民群众同样渴望从资本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通过反对资产阶级及其附庸的艰苦的阶级斗争，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就创造了新的经济条件，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由这种新的经济条件中产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利用把大工业、铁路、银行、对外贸易等变为社会所有，即国家所有的手段，掌握了经济命脉。

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一种工具，工人阶级利用它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保卫国家，把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国家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具。只有依靠它，工人阶级才能着手解决过渡时期的任务，才能胜利完成这些任务，因此保卫和巩固工农政权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

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经过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并且胜利地结束了这个时期。这个国家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历史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性。到现在为止，人类历史上没有一种社会科学得到这样的证明。如果在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胜利地发展了一

^①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51 页。

百多年后的今天，在二十世紀的中叶，卡尔斯卢埃有一帮法官和檢察官要把馬克思列宁主义送上法庭的話，那么他們只是証明，历史早已給他們的社會制度宣告了死刑。

苏联人民在过渡时期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經驗，他們所創造的經濟領導的新形式，他們在社会主义建設中所探尋的，并且胜利地走过了的新道路，这一切都成了进步人类的公共財產。在苏联的政治經濟学教科書里，这些新事物第一次被总结起来，概括起来，并使之系統化。因此这本教科書对于所有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国家，也对于我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了研究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宝贵的基本材料和解决过渡时期各項任务的实际指南。

过渡时期的特色是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旧的資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已經說明，过渡时期是以新与旧的暂时并存为其特征的。在这里，新与旧的比例在过渡时期初期当然与过渡时期末期迥然不同。在經濟方面，过渡时期的特征是存在各种不同的經濟形式，最主要的有下列三种：

一、社会主义經濟

二、小商品經濟

三、資本主义經濟

同这些經濟形式相适应，在过渡时期还有各种階級。主要的階級是工人階級和劳动农民階級，此外还有资产階級。他們依賴于現存的、資本主义的工業、運輸業、商業和農業企業，并且依靠在其他国家占着統治地位的资产階級的支持。

因为無产階級政权是完成过渡时期各項任务的最重要的工具，所以过渡时期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要巩固作为無

产阶级政权基础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

过渡时期最重要的经济任务是在所有经济部门建立、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一任务只有不断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决定这一斗争的结果。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苏联教科书中这样确定——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前者是新生的，但是开始还弱，未来是属于它的；后者是被推翻了的，但是起初还强，在小商品生产中有它的根源，它是过去的东西。解决这个矛盾的速度要看劳动人民是不是把社会主义建设看做自己的事情。

解决过渡时期任务的要点在于主要用经济手段达到变革的目的，所以无产阶级政权在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利用经济政策解决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同农业经济以及其他经济形式之间的经济联系。由于小农经济的商品性质决定，通过买卖的交换就成为这种经济联系的适当形式，因此工业同农业之间的商业结合就成为经济的必然性。但是商业是以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为前提的。一九一八年列宁就已经制定了适合于利用商业和货币流通的经济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以新经济政策的名称载入史册。它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在一九二一年代替了在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曾经是必要的战时共产主义的原故。战时共产主义是以余粮收集制、禁止贸易和工业中的实物供应制为基础的。与此相反，新经济政策是：

“利用市场、商业、货币流通来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①

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超过税额的农产品可以自

由买卖。商業成为社会主义工業和小农經濟之間的最重要的紐帶。向新經濟政策过渡的同时，在工業方面也由实物供应制轉变为买卖制，因此国营企营就有必要实行經濟核算制。新經濟政策的本質是工人階級和劳动农民的經濟联盟，是利用經濟杠杆，自觉地运用客观經濟規律广泛地代替經濟領導上的行政方法来建設社会主义。新經濟政策是在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运用社会主义客观經濟規律的方法，因此政治經濟学教科書有理由指出，苏联实行的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任何一个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行动指南。事实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也正是根据列宁所制定的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则进行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是根据这些基本原则来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新經濟政策是工农国家在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的具有特色的經濟政策。在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意味着过渡时期的結束及新經濟政策的結束。

由于無产階級政权創造了新的經濟条件，因而資本主义客观經濟規律就在过渡时期的过程中失去了它的作用，而新的社会主义經濟規律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由于正确地执行新經濟政策，这种規律就日益扩大它的作用范围，成为在整个国民經济中占統治地位的規律，而資本主义經濟規律却終于退出舞台。

过渡时期的特点是存在各种不同的經濟形式，同样，在过渡时期中存在不同的經濟規律——資本主义規律和社会主义規律——也是过渡时期的特征。因此討論过渡时期的經濟規律（常常有人这样做）是不对的。过渡时期沒有它自

⊙ “政治經濟学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7頁。

己的規律，它是社会主义經濟規律排除和代替資本主义經濟規律的历史时期。同样，討論过渡时期的特殊基础也是不正确的。政治經濟学教科書上說：“在过渡时期內要消灭旧的資本主义的基础，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①

因此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一个階級斗争的时期。这斗争是在各种各样的形式下进行的。在斗争的过程中，工人階級吸引了愈来愈广大階層的人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設。同劳动农民結成联盟的工人階級利用它手中的国家政权、經濟命脉和它所掌握的社会主义客观經濟規律，以保証生产力的發展（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所需要的），巩固并扩大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使得社会主义經濟規律的活动范围日益广闊。

随着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形成，在社会主义成分中开始起作用的社会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也就产生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掌握着經濟命脉，因而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就逐漸对于整个国民經濟的發展發生影响。壟断資本主义的基本經濟規律失去了效力，剩余价值規律只在資本主义成分中还起作用，这种作用愈来愈受到限制。

同資本主义的竞争和無政府状态的規律相对的，产生了国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并且开始逐漸發生作用。这个規律使得有計劃的經濟領導和各个經濟部門之間有計劃地形成正确的比例成为必要和可能。这个規律的作用是随着社会主义經濟成分的壮大和扩展而扩大的。

資本主义的工資規律在社会主义經濟成分中失去了作

^① “政治經濟学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1頁。

用，按劳分配的經濟規律代替了它的位置。

由于經濟狀況中的这些改变，价值規律發生作用的一些条件在过渡时期中也起了根本的变化，而价值規律的繼續存在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繼續存在为条件的。但是价值規律的無政府状态的作用日益受到限制，它受社会主义的某些条件所制約，并且变为社会主义經濟領導的一个重要工具。

每个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国家大体上都会經過这兒勾画了一个大致輪廓的苏联过渡时期的發展过程。可是每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就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二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表明，除去它們的民族特点之外，同苏联的發展相比还有几点重要的区别，这些不同点对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是非常有利的。这些不同点是：

一、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軍事干涉和反革命的自衛軍分子挑起的內战，苏联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經濟政策，这一政策使得苏联能够战胜苏維埃政权的敌人。一九二一年春天战胜干涉者和反革命分子以后过渡到新經濟政策，因此这政策本身就含有退却的因素。关于这一点，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中說：

“战时共产主义是用冲击手段，用正面进攻手段攻破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尝试。在实行这个进攻时，党向前面跑得太远，有脱离自己根据地的危險。列宁現在主張稍許后退一点，暂时退到更接近于自己后方的地方去，由冲击手段轉到较为长期的包围敌人堡垒的方法，以便积蓄起力量后，再去开始进攻。”⁽¹⁾新經濟政策执行一年以后，列宁就宣布說，退却結束了。

由于苏联的支持，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没有发生外国干涉战争，因而这些国家没有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所以这些国家运用新经济政策的原则也就不表示一种退却的因素，而是从最初起，新经济政策就是无产阶级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特点在第一个阶段已经通过向资本主义阵地进行经济上的攻击表明出来了。

二、苏联是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它仍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苏联人民承担了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资本主义的全面包围下，在一个国家里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无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或者在农业集体化方面，它都得不到外界的任何支援。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同国内敌人作艰苦的斗争，在国外的经常威胁之下，苏联人民在他们的光荣的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事业。

今天的形势是多么不同啊！在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开始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苏联领导之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差不多拥有十亿人口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里的每一个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都得到了苏联以及这个阵营里的其他国家的兄弟般的援助和支持。这个阵营组成了世界民主市场，这个市场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需要单独建设社会主义了，它可以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力量，特别是依靠社会主义苏联的无私的援助。

三、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走上从未有人走过的社会主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第316页。

义發展道路的国家。虽然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經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路綫，可是要緊的是必須在苏联过渡时期的现实条件下，确定恢复国家經濟、社会主义工業化、农業集体化、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質福利、实行文化革命的具体措施。这首先是列宁的不朽功績，他創立了过渡时期的理論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經濟学，斯大林写了一系列新的經濟科学著作，进一步發展了这种学說。今天我們在“政治經濟学教科書”里讀到关于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国民經济体系的綜合叙述，完全是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設中所积累的丰富經驗的科学概括。

这就給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內的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减少了許多困难。今天我們不必冲到沒有人探究过的領域里去，我們不必去寻找在过渡时期中产生的一些新的經濟規律，不必探究它們的作用——这一切苏联人已經給我們做了。我們的任务是徹底研究这些經驗，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并且学习在我們的条件下，正确地运用这些經驗。我决不是說，这是一个輕而易举的任务，我們大家都認識到这件任务是困难而复杂的。虽然如此，同苏联人民和他們的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所必須解决的任务比較起来，我們的任务容易得多了。苏联人解决了这些任务，同时也給各国人民完成了極有价值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准备工作。对于我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是如此。

四、最后，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軍事形势同苏联在过渡时期中的軍事形势也有所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存在一天，就沒有一个国家，特别是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能够保証不受軍事进攻。一九一八和一九四一年，帝国主义分子向苏联發动了进攻，同样，今天他們还在做梦，想用軍事力量阻止

和扭轉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一九五五年二月底，波恩联邦議會批准了巴黎战争条約，这就表明帝国主义陣营是多么严重地威胁着我們的安全。只要世界还分成两个陣营，那么保衛社会主义成果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一項特殊任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議院和政府公开宣布，他們充分認識到这件任务，并且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衛我們和平建設的成果。

可是在这一点上，今天的情况同苏联在过渡时期所处的情况也完全不同。当时苏联是唯一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立的国家。当欧洲一系列的国家，其中包括法国，遭受到法西斯的襲击，英国担心它的生存而在發抖的时候，只有苏联抵抗着希特勒的强大的战争力量，并且終于打垮了它。今天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陣营緊密地团結在一起，同心协力地防止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今天这个陣营的領導力量，苏联的威力比起希特勒發動瘋狂进攻的时候，已經大大地增强了。和平陣营的各个国家，其中包括拥有六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增加了苏联的力量。今天帝国主义者發出关于原子彈、氫彈或鈾彈的歇斯底里的叫囂时，就使我們記起戈倍尔在战争最后阶段关于所謂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神妙武器的叫囂。当然新式武器是可怕的、大量毁灭性的工具，只有罪犯才能拿它威吓別人。可是战争挑撥者不要忘记，美国的城市和英国的島屿也同地球上任何別的一点一样害怕这种武器！

我們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知道，战争的胜敗并不決定于任何神妙武器，而是決定于人，決定于人所生活的社会状况。懂得解釋二十世紀的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正不可遏止地向着社会主义胜利的方向發展，并不像那些蠢才从一

个世紀以来就假定的那样，是因为外国人和异乡人散布叛乱的思想，而是資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本身所促成的。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資本主义發展本身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任何战争都不能阻止这种过渡，它只能使它困难些，使它流血，付出牺牲的代价。因此我们的政策就是根据危险性的大小，动员我们的力量，保卫我们的成果，同时尽一切力量阻止战争发生，争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这样我们就能把力量集中到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和平工作上去。

从以上所说的苏联同其他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不同点可以得出结论，由于苏联人民所做的工作，其他国家完成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任务就比苏联当时容易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特点和阶段

除去对于在总危机的第二阶段进入过渡时期的一切国家都适用的基本特点之外，各个国家还有它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对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具体措施发生影响。我们来研究一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这些特点。

对于我们共和国的一切措施发生影响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德国被帝国主义者分成两部分，因而产生了对德意志民族的统一的一种严重威胁。由于这种分裂，为争取德国的民主统一而进行斗争就成为中心问题，一切其他问题都必须和这个问题相一致。

从合乎历史规律的观点看来，在整个德国很早就有一种迫切的必要，解决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之

間的矛盾。壟斷資本的桎梏不僅阻礙生產力的自由發展，而且也給整個德意志民族製造了致命的危險。壟斷資本兩次把德國人民投入毀滅性的、絕望的世界大戰之中並且在德國建立了法西斯主義。一九一八年，歷史就已經提出了使生產關係同生產力性質相一致的任務。因為當時這個任務沒有能夠解決，所以德國就向着導致法西斯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深重的道路發展。同樣的問題在一九四五年更加迫切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戰勝國在波茨坦協定中達成的協議証明了這一點。戰勝國確定了“消滅目前卡特尔、辛迪加、托辣斯及其他壟斷組合所形成之經濟力量之過份集中”的目標。當時整個德國的廣大人民群眾也是為達到這個目標而努力的。只要舉出黑森的人民投票贊成把基本工業移交給人民這件事就可以證明。可是西方戰勝國家，特別是在波茨坦協定上莊嚴地簽過字的美國，實際上不願意清除德國的壟斷資本，而是想把它保留下來，為它自己的帝國主義目的服務。因此它在西德和南德破壞波茨坦決議的實施，藐視人民以民主的方式表達的願望，並且恢復了德國壟斷資本的權力。舉幾個例子就可以說明這件事：“被分散了的”冶金康采恩，一九四五年有九億六千四百萬馬克的股本，今天有二十七億六千七百萬馬克的股本。法本化學托辣斯在全德國曾經有十億九千四百萬馬克的股本和準備金。它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領域內喪失了一半的財產以後，今天繼承它的幾個最重要的公司又擁有十億八千五百萬馬克的股本和準備金。汽車工業中的兩個最大的托辣斯，國民汽車工廠和歐培爾工廠，一九五二年生產的小轎車占總產量的百分之五十六點五，一九五四年就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五點七。三家大銀行（德意志銀行、德累斯頓銀行和

考迈茨銀行)的結算額一九三八年达八十亿馬克,而繼承它們的事業的銀行在西德大大縮小了的地区上增加到一百三十亿馬克以上,它們的貸款从三十三亿馬克上升到五十八亿馬克。

因此产生了这样的事实,只有在德国的一个部分,在今天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才能着手并且开始执行,解决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質之間的矛盾的这一历史性的偉大任务。

可是这时也就出現了历史的特点:德国法西斯的国家政权不是被德国工人階級的革命行动摧毀的,而是被战無不胜的苏联軍隊摧毀的。德国工人階級和一切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抵抗的力量太弱,沒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同时也要考虑到,与进行反法西斯抵抗斗争的人民民主国家相比,德国缺少民族解放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在被法西斯压迫的国家曾經有力地推动了反法西斯斗争。苏联軍隊摧毀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政权,这个政权曾經利用雅里安优秀种族的有毒思想,殘酷地压迫和剝削其他国家的人民。

由于苏联軍隊解放了德国东部,德国民众力量就获得了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它开始根据波茨坦协定建立新的民主的行政机构。当然,在新建設中,由曾經是反法西斯抵抗斗争的領導力量的工人階級担任領導。

根据波茨坦协定,德国的这一部分在苏联占領軍隊友好的支持下,进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剝夺了德国最反动的階級,东易北河的容克地主的权力。农民、农业工人和移民們得到了土地。按照波茨坦协定,通过沒收战犯財產消灭了資本主义壟断。他們的企業变成了人民的財產,由此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質之間的矛盾就开始

得到解决。在文化领域方面，上千年的有产者的教育垄断被打破了，德国文化民主发展的道路打开了。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长起来的新的国家政权并不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人民民主革命的结果。它是在摧毁了帝国主义国家机器以后产生的。但是工人阶级能够通过实现本身的统一，加强领导作用，巩固与劳动农民的联盟，把所有民主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由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阶级给工农政权创造了人民民主的基础。由此就有了开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前提。在这一工作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阶级积累了领导社会和国民经济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于解决过渡时期的任务是不可缺少的。

这个新成立的国家政权在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了革命的变革，其结果就创造了适合人民共和国发展的新的经济条件。

在这些革命的变革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战后第一个发展阶段居于首要地位；土地改革是反封建的革命，建立民主政权是反纳粹、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在战后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反法西斯的民主机构成长为工农政权。可是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这两个阶段严格地分开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互相错综在一起的。因此在第一阶段就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由于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同生产力性质相适应的规律，在绝大部分的工业中建立了公有制，一九五〇年已占工业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一。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所有制）的建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开始决

定生产的目的。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要忘記，土地的国有化是不能作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个任务来完成的。

由于德国分裂这一事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比其他人民共和国有一个較长的过渡时期，各种經濟形式并存的时期也要长些。因为在执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总的經濟政策时必须經常考虑到它对于整个民族的意义。瓦尔特·烏布利希在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二十一次全会上說过：

“我們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們必須从这一点出發，即我們的政策必須永远同为恢复一个民主德国的統一而斗争的战略战术相一致，由于我們祖国被分裂，在我們国内就产生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特殊困难……

过渡时期的特点是同时存在各种形式的生产資料所有制。除去工業、运输業、商業和農業中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成分之外，还有許多农民和手工業者的个体經濟，这些人是简单的商品生产者。此外还有一批中等的资本主义企業。党的經濟政策是从这些經濟成分长期并存这一点出發的。”^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也在于，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質，也就是說，要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获得胜利。可以預計，这一任务的解决将大大地促进在民主基础上恢复德国的統一，因为它使西德人民看到，他們怎样才能解决今天已經成为西德經濟的特征、将来一定还要更加尖銳化的矛盾。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德国被分裂这一事实，在德

^① 瓦尔特·烏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經濟学問題”柏林迪茨出版社1954年版，3至4頁。

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經濟措施的执行中，产生了許多重大的困难。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全部复杂性是由于过去十年德国两部分的不同發展产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开始解决历史性的矛盾，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在西德，具有一切反动和侵略特性的德国帝国主义又在違反波茨坦协定的情况下复活了。美国壟断資本在这方面的帮助以及占領当局使得德国帝国主义依賴于美国帝国主义，这样，西德的劳动人民就遭受到双重剝削。壟断資本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在西德發揮着把全部重担压在所有劳动阶層身上的作用。

一九五四年許多重要部門的工人，如五金工人、紡織工人、公用事業工人以及其他工人为了反对他們的状况的不断恶化而进行了大規模的要求增加工資的斗争，这一事实最明显地証明了西德工人阶級的状况。虽然工人們通过这些斗争，工資得到了一些提高，但是他們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因为生活費用的增长早已超过了工資的提高。正如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的“工業快报”上所报道的一样，西德的一个消費研究所向三百七十二个工人詢問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以来增加工資的結果。問題是增加工資有沒有提高購買力。百分之四十三的人給了肯定的答案，百分之三十九的人給了否定的答案，百分之十八的人沒有發表意見。这就是說虽然經過斗争工資有所增加，但是一半以上的工人并没有感到他們的状况有所改善。与此相反，也在一九五四年，西德工人遭受到更为厉害的剝削。一九五四年一月到十月，在西德工業中每一小时的成品比一九五三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三点二，在基本原料和生产資料工業中甚至增加

百分之七点六^①。一九五四年，在西德已登記的失業人數達一百二十萬人。西德勞動人民的債務增加特別清楚地說明他們的貧困處境。據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漢堡“世界報”報道，在過去幾年中，五個顧客中有四個（也就是百分之八十）是分期付款的，十家有四家欠糧食商人的帳。

西德農民一九四八年負債二十四億馬克，一九五三年增加到六十五億馬克^②，這一事實最好地說明西德農民日益貧困。西德的手工業者、小商人和小企業主的境遇也并不比農民好些。一個確切的標志就是西德空头支票和付款命令及執行命令的數目逐年迅速增加。一九五〇年每月平均有兩萬零六百六十四張支票，一千四百六十萬馬克的款項付不出錢，而一九五二年是兩萬九千二百四十三張支票，一千六百九十萬馬克，一九五四年（一月至十月）是四萬五千七百二十五張支票，二千六百萬馬克^③。埃森、海米姆和奧拜豪森市區的區法院的付款命令和執行命令的數目達到^④：

	付款命令	執行命令
1951年上半年	37,255	22,846
1952年上半年	42,371	29,650
1954年上半年	50,273	35,043

波恩經濟政策的特別悲慘的事件就是西德知識分子的貧困處境。只要舉幾個例子就可以說明整個情況。西德高等學校中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教師（講師和助教）每月只拿到二百至五百馬克的薪金。許多高等學校的教師都被迫尋找

① “德國經濟研究所報告”，第一號，1955年1月，第十八頁。

② 1954年7月31日“新德意志報”。

③ 威斯巴登聯邦統計局，“經濟與統計”，按月統計數字。

④ 1954年8月5日“埃森日報”。

副業。最低月薪四百八十馬克的法学家們被“法兰克福大众日报”描繪为“法律的挨餓牧师”。情况特別恶劣的是西德的医生。被雇用的二万七千个医生之中差不多有一万七千人是充当助理医生。其中有七千人是按照薪金表支薪的，八千人的薪金低于薪金表所規定的，两千人的工作是沒有报酬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們可以在医院里吃飯，拿到三十到五十馬克的零用錢。同样，西德的自由創作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境遇也是非常悲惨的。一九五四年在下薩克森所作的一次調查說明大多数的作家、作曲家和造形美术家依靠他們的家屬的收入生活。慕尼黑的一千名自由創作的画家和雕刻家之中，只有不到五十人能够根据合同得到比較合乎常規的收入，其他的人都靠救济金生活。这是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号弗拉堡的“巴登日报”报道的。

同西德各劳动阶层的悲惨境遇相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却一天比一天幸福。国营工厂中一个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资是：

1950	261 馬克
1951	285 馬克
1952	312 馬克
1953	339 馬克
1954 (上半年)	357 馬克

一九五四年平均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九点二。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农民的純收入增加了一倍二点二。大家都知道，在我們共和国知識分子的生活状况怎样得到了改善。在我們这兒沒有高等学校的教师、医生、作家、艺术家等等为物質貧困所迫去寻找其他工作。这种情况使得我們能够肯定地說，与西德旧的帝国主义制度相比，德意志民主共

和因——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已經开始在这里發生作用——新制度的优越性已經明显地表現出来了。

靠着外国的帮助，德国帝国主义在西德又复活了。今天已經十分显明地表示出它保持着旧有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但是很明显，复活了的德国帝国主义比較旧日的德国帝国主义弱些，它也不可能恢复从前的力量。因为在它手里的已經不是整个德国，它受着它的最大的竞争者美国帝国主义的約束，它在前进的阶段上为同样的内部矛盾而苦恼，这些矛盾是旧日的德国帝国主义就沒有能够解决的。与此相反，在德国的另一部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制度。一种新的、进步的生产方式在这兒發展，对于西德的进步力量來說，它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吸引力。我們共和国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成就的偉大的民族意义就在于此。

西德的統治者企图使群众相信，新建立起来的德国帝国主义削弱了的力量可以通过把西德与美国帝国主义結合起来而得到补偿。但是十分明显，事实上完全相反。因为与美国帝国主义相結合就把西德經濟隶属于背负着危机和灾难的美国壟断资本主义。对美利坚合众国來說，一九五四年显然是存在危机的一年。与一九五三年相比，鋼的产量降低了二千一百一十万吨，小轎車的生产減縮了百分之十点二，卡車的生产減縮了百分之十五点三，工業生产指数降低了百分之六点七，这仅仅是举了几个数字^①。人們并不需要什么預言的才能就可以断定，这种危机的現象对于西德是会發生影响的。如果危机尖銳起来的話，美国壟断資本

① 1955年3月2日莫斯科“真理报”。

将毫不犹豫地把危机的重担压到它的僕从国家身上，特别是西德身上。今天，头脑比较清醒的西德经济界人士已经认识到美国的控制绞杀了西德的商业，并使它脱离了它在东方的最重要的销售市场。他们也看到美国的所谓援助今天已经使西德负了一大笔债务，这笔债务将使西德人民好几辈子成为欠美国垄断资本的债的奴隶。

相反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灾难性的循环，危机——战争——危机已被克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着，人民享受着自已的劳动成果，不负任何债务。

德国两个部分发展的这种根本差别扩大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切措施，特别是经济措施对于德国人民的民族斗争的意义。

除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这一最重要的特点，即德国的分裂之外，还必须举出另外一些由于德国的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民族特点。

在过渡时期开始以前，德国早就是一个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二十世纪初，德国已经在世界工业生产方面仅次于美国而居第二位。一九二五年德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四点四，而农村人口只占百分之三十五点六。德国的工业具有高度的技术，而且非常集中。高度发展的机器制造工业起着领导作用。根据一九二五年企业统计，工业部门从业人员中有百分之四十在基本原料和生产资料工业中工作，其中有百分之十二是在建筑业中工作。仅在机器、器械和交通工具制造工业中工作的人就占工业从业人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十。

由于这个特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具有特征性的任务就不像其他国家一样是工业化，是把农业国变

为工业国，它的任务却是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革。这个任务很重要的一部分已经通过在工业中建立人民所有制——国营工厂——而得到解决，它将继续通过我们社会主义工业数量上的迅速增长和质量上的迅速提高而获得解决。此外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必须克服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由于德国的分裂而新产生的不合比例的情况。这个任务我们也已经开始解决了。由于新建和扩建了冶金工厂，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的薄弱的冶金工业基地得到了显著的发展。现在我国劳动人民正在努力克服煤炭、电力和某些化学工业部门发展不足的情况。

社会主义不可能没有大机器工业，也就是说没有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凡是没有重工业的国家——过去的苏联，现在的大多数的人民共和国——必须在过渡时期建立重工业。由于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了包括机器制造业在内的高度发展的重工业，因此我们在过渡时期的任务就大大减轻了。当然这必须有两点限制。我们的大中工业企业由于战争的影响，特别是由于美国和英国飞机的轰炸，破坏得非常厉害。一九四五年，我们几乎每样东西都要从废墟中挖漏出来。然而在一九五〇年我们就已经能够超过战前工业生产水平了。这首先要感谢我国工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无限的工作热情以及我们苏联朋友的无私的援助。

此外由于德国的分裂而产生了一些严重的不合比例的现象，因为德国内部的贸易受到阻挠，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发展一定的工业部门来克服这种现象。

击溃希特勒法西斯以后，我们的决定性的力量是工人阶级。德国资本主义工业的高度发展也创造了为数甚多

的、掌握了高度专门知识的无产阶级。几十年来，德国工人的劳动在全世界享有很好的声誉。德国的工人阶级也有过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它最优秀的力量——一九四六年促成了两个工人政党的联合——在反对法西斯独裁的斗争中受到过锻炼。这样一个工人阶级的存在也使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任务容易解决得多。对于其他一些国家有着非常重大意义的任务——扩大工人阶级的队伍——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却没有同等的意义。目前甚至有另外一件任务摆在我们前面，那就是为了克服农业上的落后状态，把进步的工人转到农业中去。

但是我们也不能低估了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德国工人阶级比较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较为严重的、较长时间的受了改良主义、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广大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改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过渡时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人阶级中所发生的成分上的变化使得这个任务具有更大的意义。战争使得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无法生活，一九四五年以后法西斯国家的很多职员失去了维持生活的基础。这些人在工业企业中找到了归宿，然而他们的思想一点也没有改变。发扬新的社会主义的意识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它只有在顽强地反对现存的资本主义观点的斗争中才能实现。

现在我们再谈谈德国的另一个特点。虽然德国的农业也像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远远地落后于工业，可是比起其他国家来，它还是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的。在德国使用机器、电力和化学肥料还是相当普遍的。因此在德国每公

頃的產量也比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大國高得多。譬如一九二七年每公頃的產量(以一百公斤為單位)達到：

	小麥	黑麥
德國	18.8	14.5
法國	14.2	11.5
意大利	10.8	12.1
美國	10.0	10.0

戰前在德國就已經特別發達的是畜牧業，它的產量差不多占農業生產的三分之二。畜牧業的產量也比其他資本主義大國高些。

德國的農業經歷過一段漫長的苦痛的“普魯士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它的特点是，中古時代的土地占有關係沒有一下子被消滅掉，而是慢慢地和資本主義相適應，所以還有一個很長的時間，半封建的狀況附着於資本主義。”^①這條“普魯士道路”的最重要的結果就是保存了普魯士的容克世家，他們是農業人口中一個重要的部分，直到最近一個時期都保持着半封建的統治權。一九四五年的土地改革才把這些封建主義的殘余掃清了。

德國農民之中，階級差別是很大的。一九三九年占全體農戶百分之零點五的三萬四千個地主占有所有土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而五百多萬貧農的土地還占不到百分之十。雖然貧農只有經受巨大的貧困，通過最大的努力才能保住他們的產業，雖然他們往往只有經常在工業部門工作才能獲得他們微少的生活費用，可是他們仍然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這些土地常常已經傳了好幾輩子了。對中農說來，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五卷第117頁。

情况就更为严重。恩格斯所说的“顽固的私有观念”在德国农民身上特别得到发展。当然这就给过渡时期的巨大任务，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增加了困难。

一九四五年进行的民主的土地改革并没有把土地收为国有。在这次土改中仅仅没收了战犯、纳粹头子的土地以及一百公顷以上的私人占有的土地，把这些土地变为国家的土地基金。在这些土地的一小部分土地上建设起国营农场，从而在农业中产生了公有成分。绝大部分土地都分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民、雇农和移民，算作他们的私有财产。由此贫农和中农的数目大大增加，在农村中为民主创造了牢固的基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获得了一个新的基础并且大大巩固了。在把土地分给移民时，使得过去的富农也得到了土地，因而变成了贫农和中农，当然，他们的思想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

德国工业的高度发展以及农业发展水平较高使得过渡时期通过合作化，领导农业小生产者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任务容易完成。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商业结合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并且较快地通过生产结合得到补充。另一方面由于德国世代务农的农民的顽固的私有观念就使得这一任务的解决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与德国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相适应，在它的所有部门，包括农业在内，商品关系非常发达，因而商业和运输业具有很大的意义。一九二五年商业和运输业的从业人员就已达一千零五十万人以上。

对外贸易的结构给我们指出德国经济的另一特点。八十多年以来，德国就日益需要从国外输入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这种输入是可以属工业成品的不断增长的输出相

抵的。一九二八年进口的粮食、饮料、原料和半成品，占全部进口物资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五，而出口的制成品占全部出口物资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二。虽然由于农业的迅速发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粮食进口的需要已经有所减低，可是上述的比例大体上仍然适合于我国的情况。由于同苏联以及整个世界民主市场建立了紧密的关系，我们共和国既能输入需要的商品，也能销售我们的成品。

当我们考虑到所有这些特点，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到目前的发展作一次全盘考察时，我们可以把它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互相错综在一起，所以我们不能形式地把它们分开。

第一个阶段是到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为止。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其他的变革，反法西斯的民主秩序的国家机构成长为工农政权的国家机构。随着帝国主义的消灭，在工业、运输业、银行业、保险业、农业和商业中形成了国营成分。随着最重要的大企业投入生产，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计划化。这样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并且开始发生作用。

第二阶段是从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开始的。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工农政权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巩固起来。两年计划（一九四九——一九五〇）的完成加强了国营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优势，同时它也使我们能够向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过渡，使我们能够制订和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五年计划方面的成就使得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结合的加强以及使农业走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可能。其次，工业和农业发展上的成就使得对劳动人民的物质供给能够

向前迈了重要的一步(实行新方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范围在第二阶段里显著地扩大了,并且成为影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占统治地位的规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概况 和经济规律的作用

由于工农政权的组成和巩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条件,由于国营经济的形成和扩展,有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条件。任务在于,在过渡时期中清除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时候上层建筑,工农国家,工人阶级的政党,新的意识起着一种非常积极的作用。工农国家是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决定作用的工具。工人阶级是这一建设中的领导力量。

社会主义基础胜利的前提是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的建立。这种物质生产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就意味着社会性的生产和社会性的占有。可是今天社会性的生产只有在社会性的生产资料,即所有经济部门的现代化的大机器工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所有国家在过渡时期都面临着这样一些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把细小、分散的农业引上大工业的、集体的农业生产的轨道,同时消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劳动人民的贫困化,经常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状况。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三个基本任务也摆在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面前。

我已經說過，在德國解決第一個問題是有有利條件的。重工業和機器製造業不必新建，相當數量的技術骨幹已經具備。第一個任務在於賦與這些工業以社會主義性質。這是通過把它們轉變為社會主義財產開始的。通過建立新的並且擴大現有的社會主義企業，通過不斷地改進國營工業中的社會主義領導方法，通過經常適當地利用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社會主義的大工業繼續發展着。第二個任務在於克服目前不合比例的現象，這一工作是從大力發展我們的冶金工業開始的，現在還將通過加速發展煤炭、電力以及化學工業中的某些部門而繼續這一工作。

拖拉機和農業機器製造工業的高度發展也給農業方面的社會主義大生產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在這一方面現在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在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的生產形式的情況下，克服農業普遍落後於工業的現象。這就需要利用個別農民經濟中的巨大潛力。

在改善勞動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狀況方面，特別是最近幾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獲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掌握和正確運用為在這一方面繼續前進創造了前提。

新的社會生產關係特別推動着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這是社會主義勝利不可缺少的條件。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中出現的生產關係和現代生產力性質的一致為發展社會主義物質生產基礎創造了決定性的條件。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是發展生產力的最重要的推動力。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生產關係帶有過渡時期的性質。在目前的發展階段，它的特点就是具有三種形式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因而也就具有三種經濟形式。現在在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有：

甲、社会主义所有制，分为两种形式：

1. 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国家所有制和公有制，以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银行业和保险业中的国营成分为代表；

2. 集体所有制，以消费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商业合作社以及其他农民合作社（乳酪业合作社等）、渔业合作社以及手工业合作社为代表。

这两种所有制形式构成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它在工业方面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在农业方面约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铁路、银行、保险、对外贸易全部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

可是还必须注意到，这些合作社本身仍然部分地具有过渡性质：譬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不能同苏联的集体农庄同等看待，因为前者所耕种的土地仍然是属于社员私人所有的。因此一部分收入不是按照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的规律而是根据入社的土地股份，作为绝对地租的一种形式来分配的。虽然如此，农业生产合作社无疑地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我们共和国还有纯粹资本主义的合作社，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乙、其次，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它存在于下列三个方面：

1. 贫农和中农的私有经济；

2. 手工业者经济；

3. 私营零售商的小企业，这些人没有生产资料，但有私人的流通资料，靠自己的劳动生活。

这三部分构成小商品经济。它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具有很大的规模。在农业方面，小商品生产占总生产量的

一半以上。手工業大約有二十五萬個企業（有八十萬個從業人員），一九五四年總銷售額達到六十五億馬克以上。在零售商業方面，一九五四年有十七萬個私營商店。手工業和零售商店的規模從實行新方針以後擴大了。私營零售商從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四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在同一時期，手工業生產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丙、最後還有資本主義所有制，存在於六個方面：

1. 資本主義工業企業；
2. 資本主義性質的大型手工業企業；
3. 富農經濟；
4. 批發及零售商業中的資本主義企業；
5. 資本主義的運輸企業（航運和動力運輸）；
6. 資本主義的合作社。

這六部分構成資本主義成分。它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是相當大的。一九五四年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在共和國的生產品總量中占百分之十五。在這一年它的生產量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富農經濟還義務交付大約百分之二十的商品生產。在批發商中還有八千多家私營企業。

第六點中提到的資本主義合作社所有制需要有一點解釋。大家都知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有的合作社，甚至於工人消費合作社都是受資本主義規律所支配的。在工農政權的條件下，許多合作社改變了它們的性質，譬如消費合作社、轉變為農民商業合作社的農業購銷與信貸合作社（從前的賴發進農貸協會）、乳酪業合作社等等。它們在新的條件下變為社會主義的合作社。但是並非所有的資本主義合作社都是如此，也有的合作社仍然保存着資本主義性質。舉凡

个例子：

今天在西德还有一九〇七年成立的“已登記的社团，德国商人合作社艾德卡（即德国食品商收購合作社）联合会，一九二八年，这个自己拥有一个銀行的联合会的批發銷售額达到一亿馬克。即使在今天，这个資本主义的大联合会在我們的共和国还有一百二十六個做批發生意的地方性的收購合作社。

在德累斯頓有一个鷹記釀酒合作社，共有二百个工人。

馬克特堡行政区的克洛采制酒合作社大約也有二百个工人。

萊格勃魯赫制刀合作社約有三十个社員，二百个职工。

哈尔登斯來本县多倫浸麻工場，也是一个合作組織，約有二百个工人，每年貿易額为二百万馬克。

斯登达尔地方的老美而克罐頭工厂合作社約有六十五个职工，每年貿易額为一百万馬克。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繼續举下去，因为除了那些較大的資本主义合作社之外还有很多較小的合作社，举例說，有一千八百个手工業購銷合作社，大概有一千个各种农業及林業合作社（既不是农業生产合作社，又不是农民商業合作社），二百个住宅及建筑業合作社以及很多其他的合作社。如果我們把所有这些合作社都划为社会主义成份的話，那我們就要犯一个原則性的实际上的大錯誤。它們之中的極大部份只能是屬於資本主义成份，因此在我們的經濟政策中也應該根据这样的原則来对待它們。很多較小的合作社，特別是农林業以及手工業方面的，則有可能發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除了这三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有一种范围极广的租赁房屋私有制，通过房屋租金，这种私有制每年在国民收入中摊到八亿馬克。

最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着劳动人民的个人必需品的个人所有制，包括受到法律保护住宅在内。这种所有制将随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日益扩大的作用不断地增加。今天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有很多的劳动人民，获得了比以前一生加起来还要多的私人财产。这也实际地证明了社会主义不仅把人们从剥削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使劳动人民在个人需要的一切物品上比他们在以前的社会制度下所得到的要丰富得多。

私人所有制的一个特殊形式就是合作社农民对他个人庭园经济的占有，这种占有的范围是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章加以规定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种基本形式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最重要的标志，适应它们的就有目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一种经济形式。在我们的著作中有时谈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有三种社会经济形态，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简单的商品经济并不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

这三种经济形式表现出历史发展上的一个不同的阶段。

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成份是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成份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已经消除。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德国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成份完全掌握了经济命脉：大工业、银行、铁路、机器拖拉机站和对外贸易。因此社会主

义成份影响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全部国民經济。

建立在生产資料个体劳动所有制基础上的小商品經济成份，在我們这兒是發展的最低阶段。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質之間的矛盾在这个成份中还没有展开，因为生产資料主要带有个体性質，微小而不起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列宁指出的，这个成份有着“不断地、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階級”的趋势，但是由于工农政权及社会主义成份的存在，也有可能使这些小商品生产者摆脱这条痛苦的资本主义發展道路，直接引他們走上社会主义發展的道路。在这里，工农政权对于劳动农民的巨帮助起了主要的作用，特别是通过机器拖拉机站使他們能掌握新的現代化的技术以及运用科学的方法。这样在农業上也展开了現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新的性質之間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沒有冲突而是通过个体农民自願組成农業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来解决的。同样手工業者也有可能通过組織合作社走上社会主义發展的道路。

资本主义成份是介于其他两个成份之間的一个中間的發展阶段。在这个成份里，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質之間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在整个国民經济中不起决定性作用，因为第一，这个成份相对來說还是很小，第二，沒有资本主义大企業的存在，第三，资本主义成份不掌握經济命脉，第四，社会主义成份和国家經济計划影响着资本主义成份。但是也不能忽視，资本主义成份的存在以及它内部的矛盾构成危害整个国民經济的因素。

各种經济形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过渡时期中同时存在，使得解决經济問題成为一項艰巨的任务。因此研究这些成份之間錯綜的关系和研究各种成份共存的条件下列

济規律的作用，就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經濟科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們不应当只是孤立地看到社会主义成份以及研究这个成份中苏联科学提出的社会主义經濟規律的作用，而是應該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和德国分裂的特殊条件具体研究經濟問題。

列宁曾經指出，在無产階級夺取政权后階級将存在許多年。但是階級并不是旧日的階級，而是在过渡时期改变它的性質，逐渐变成新的階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階級。我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看到这一点。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階級已經不是古典意义上的旧的無产階級了。他們既非無产，又不再受压迫，而且絕大部份也已經不再受剝削了。工人階級已經成为社会的領導力量，成了統治階級。在生产資料公有制中也有他們的一份。随着他們社会經濟狀況的改变他們的意識也改变了。他們对社会主义財產及对劳动的态度已經不同。劳动由負担及痛苦变成了一件光荣的事情。生产中的劳动竟養和工人自己提出的个人义务証明了这一点。

劳动农民階級已从財政資本及容克地主剝削中解放出来。他們对土地的渴望，得到了滿足。他們从容克地主及資產階級的附屬物变成了工人階級可靠的同盟軍。一部份最进步的劳动农民已經参加了農業生产合作社，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农民階級。馬列主义規定劳动农民階級是：

“农民是个小生产者階級，其中組成分子，好像一盘散沙，散布在全国地面上，各人单独在自己的小农庄上运用落后技术来勉强从事耕种，他們是私有制度的奴隶，是被地主、富农、商人、投机者、高利貸者等等放肆剝削的……”^①

如果認為，这个階級定义對我們的合作社农民还适合

的話，那是可笑的。他們不是分散經營而是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內。他們不是在小經濟中辛苦勞動，而是在經營着巨大的農業企業。他們不因使用落后的技術而受害，而由于工人政權的支持，他們已可以利用最現代化的技術並使用最新的科學方法。他們不再是私有財產的奴隸，而是把大部份的生產資料變成了合作社所有，再也不會遭受地主和富農的剝削了。所有這些都說明，合作社農民從嚴格的科學意義上講已經不屬於勞動農民階級，而是成爲一種新的階級形式的萌芽。全體勞動農民在過渡時期內都將變成這樣的一個新階級。因此特別重要的是，合作社農民要同個別勞動農民保持最緊密的聯繫，並且給予他們各種幫助。

工人階級、勞動農民階級和合作社農民一起構成過渡時期的主要階級。

知識份子在過渡時期同樣也改變它的性質。他們的進步份子靠近工人階級並緊緊地跟着它走。在過渡時期，從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發展了一批新型的知識份子，他們牢靠地在這兩個主要階級中扎了根。

資產階級作為剝削階級在過渡時期還會存在一個長時期。它包括工業、商業、運輸業中資本主義企業的資本家以及富農。但是即使是它們也改變了它們的性質。財政寡頭的統治已被推翻，壟斷資本家和容克地主一樣已經不知去向。剩下來的是中小資本家，只要資本主義成份繼續存在，他們就能在國民經濟普遍高漲中得到發展。

由於過渡時期中各種經濟形式的存在，就有必要充分利用商品生產、商品流通以及它們的規律。但是必須強調，

①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 675 頁。

今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商品生产还不是只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发生关系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特殊形式的商品生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商品生产不仅要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国营企业，合作社发生关系，还要和简单商品生产者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发生关系。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商品生产已不再是原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因为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并且工农国家支配着主要的商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商品生产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既包括新的又包括旧的商品生产。

利用商品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间正确的联系，从而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联盟。同时通过商品流通可以在国民经济的所有成份之间建立必要的关系。适应这些任务的政策就是新经济政策，它利用市场、商业及货币流通来达到这个目的。新经济政策的重点在于发展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经济联盟。上面已经讲过，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于有利的条件，城乡之间的商业结合可以迅速地通过生产结合来补充，这就大大地减轻了克服农业落后于工业的任务。

除了社会主义工业外，社会主义成份在农业中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以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的社会主义成份，最近几年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改造基础的农业技术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没有把地方性的农业企业计算在内，因为这是暂时的现象）

国营农场在一九五〇到一九五四年把农业耕种面积从一九四、九二四公顷扩大到二七八、二一一公顷。它们最重要的机器装备在同一时期的增长情况：

	1950	1954 (計劃)
30匹馬力拖拉機	1,103	4,758
拖拉犁	1,374	3,408
牽引聯合收割機	1,003	1,463
收割機	—	171

牲畜數量在這同一時期內也有了增加。最重要的幾種牲畜：

	1950	1954(計劃)
牛	54,700	108,000
其中母牛	17,120	50,000
豬	91,316	660,000
羊	129,388	237,000

國營農場每公頃農業耕種面積的收入由一九五〇年的一、一一九馬克增加到一九五三年的二、五八二馬克。

機器拖拉機站的增長也非常迅速，一九五〇年有五十一個，而一九五四年則達六百五個。最主要機器裝備增加情況如下：

	1950	1954(計劃)
30匹馬力拖拉機	11,638	33,450
拖拉犁	10,551	27,700
牽引聯合收割機	4,317	14,100
收割機	—	1,033

在機器拖拉機站工作的農學家由一九五〇年的五十一人增加到一九五四年的二、六〇五人。

農業生產合作社是一九五二年剛開始建立的。當時只有一、八一五個，社員三一、二二二人，土地一六〇、九三一公頃。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已經有了五、一二〇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擁有一五八、三五六個社員及八七三、八一六公頃的耕地。其中大部份——擁有七一四、八八三

公頃的三、〇六〇个合作社是最高級即第一種类型的合作社。

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僅在農作物方面比共和國的平均產量要高，而且它們牲畜的數量和質量也有了顯著的提高。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牲畜數量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

母牛	增加了	28%
豬	增加了	23%
羊	增加了	62%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到一九五四年底在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中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在這一時期中約百分之八十五的社員是從前的雇農或移民，不到百分之十是世代務農的農民。

這個事實說明，世代務農的農民對於合作社的成見只能慢慢地克服，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即使願意接受機器拖拉機站的幫助，總還願意進行個別生產。因此我們在農村的經濟政策必須比以前更多地幫助個別農民的經濟發展，通過商業結合的展開，就是說提供更多的工業品去刺激他們增加商品生產，並通過開展生產結合給予他們幫助。同時繼續加強農業中的社會主義成份，特別要在經濟上組織上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使它們成為社會主義的典範經濟，通過它們的實際例子來說服個別農民，使他們認識到農業大生產的優點。目前對於農業一種特殊形式的幫助就是把政治上和業務上老練的產業工人派到農村中去。這一點具體的表現出工人階級對農民的幫助。

在為發展我們的農業而充分運用新經濟政策的原則時，必需克服輕視和忽視農民市場的情況。在一九五四年開幕的約一一、〇〇〇個農民市場上所銷售的商品額在國

民經濟中只占極微小的地位。如果能很好地進行準備和組織的話，這些農民市場能夠成為一個極有效的經濟杠杆，利用價值規律大大地提高農業生產。

作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經濟政策的新經濟政策，是一條階級鬥爭的政策。它預計到在這個階級鬥爭中首先要利用經濟力量、經濟命脈和正在發展的社會主義客觀經濟規律。但是必須再一次注意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比起其他國家來有一些特點，這些特點是由於德國分裂而產生的，它表現在下列各點：

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受到西德和西柏林的有計劃的破壞。壟斷資產階級只是在德國的一部份——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失去了勢力，而在西德他們還充分地行使着權力。在共和國被沒收了財產的容克地主和壟斷資本家逃到了西德，並夢想再奪回他們的土地和工廠。所有這些份子在帝國主義占領國家的幫助下對我們共和國的和平建設組織阻撓和破壞，到現在還從未停止過犯罪行為。

二、對我們共和國的發展不滿的或者曾反對我們經濟制度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資產階級分子，組織了他們的“共和國逃亡”團體逃往西德。另外，西德和西柏林的凱關（部份是在美國直接的指使下）引誘專門人材及知識份子到西德去。這方面他們也使用犯罪的方法。

三、但另一方面，在恢復德國統一的鬥爭中，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和平建設中，也出現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中的進步分子緊密合作的情況。因此資產階級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就不再是一個統一的政治力量，而是已經分化了。一部份反對我們的建設，並和帝國主義戰爭販子狼狽為奸，

而另一部份則在民族斗争中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民主力量进行合作。为了吸引其企业对国民经济起作用的资产阶级进步分子参加我们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工农国家已经决定参加这些企业。

四、由于国营经济同私人商品生产者之间关系的发展，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私人生产者在经济普遍高涨下也获得了利益。在争取和平及德国民主统一的斗争中他们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一些最进步的、目光最远大的私人生产者改变了他们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态度。他们忠实于政府并积极工作。这样就有了可能将忠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那部份进步的富农也吸收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来作社员。这一点是瓦尔特·乌布利希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在莱比锡举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及积极分子第三届会议上提出的。也许看来这样一种提法在原则上是不许可的，因为我们学过，资本主义不会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但是这种意见是幼稚的，机械的。因为首先我们应该考虑到，富农这个经济定义附加的条件。把二〇公顷作为一条机械的界限只是一个不足以说明一种农村经济的真正经济性质的外部根据。这里我们举瓦尔特·乌布利希在莱比锡所引的一个例子：在克吕采县的魏顿村有个女富农盖尔达·斯托梅斯特申请加入农业合作社，因为她和她年老的父亲已没有力量来耕种他们的一五〇摩尔根，即大约三十七公顷的土地并且已经把其中一部份的土地租给了别人。这个女富农拥有将近四十公顷的土地，但没有使用别人的劳动力。这种经济同二〇公顷以下的、但剥削很多劳动力的经济相比，资本主义的性质应该说更少一些的。这一点不是很明显的吗？

其次再看一看恩格斯是怎样提出富农问题的，对于我们也会有好处。恩格斯在他的著作“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提到富农和中农时写道：

“假如这些农民懂得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趋于灭亡并且由此作出必要的结论，就让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吧，那时我们就将尽力帮助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①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宁在谈到富农时，明确地证实了恩格斯的这段话。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苏联在过渡时期曾经指出，富农分子是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同时也指出，要使广大农民群众走向集体化就必须和富农分子展开不调和的阶级斗争的事实。但是，这也绝不是说，通过接受整个富农阶级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给他们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接受忠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富农。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对每一个富农进行严格的审查。在这方面，也可以把某些，我是说很个别的几个，直到目前还顽固地坚守着二〇公顷以上的土地分子排除出去。在米比锡的盖格洛夫还有一个名叫希登努尔的富农，就没有被接受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他占有八二公顷的土地，但是他自一九四六年就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了！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必须向苏联学习，我们的原则性的路线不要形式地，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贯彻。虽然在苏联曾经不得不和富农阶级进行了极尖锐的阶级斗争，但在苏联也准许作为一种例外接受富农参加合作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第438页。

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四日的一个决议中规定：

“在严格遵守不接受富农分子和其他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个人参加集体农庄的规定下，对于忠实于苏维埃政权的红色游击队员，红军和红色舰队的成员(士兵和军官)，农村学校男女教员的家属可以作为例外情况处理，只要这些人能担保他们的家属。”

由此可见，就是这个問題，在坚持原则性路綫的情况下，也必须考虑到具体条件才能得到解决。

当然，随着接受占有较多土地的富农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就会产生新的問題，特别是关于土地分紅的問題必須重新規定。

总之，可以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阶级斗争在过渡时期也必然是更加尖锐，并且由于德国的分裂而具有了特殊的形式，这就使得对群众进行革命警惕性的教育成了特别迫切的任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到目前发展的最重要的经济结果是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在数量和質量上都比其他方式优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創造了新的经济条件，在它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经济規律，即社会主义经济規律，并且开始发生作用。资本主义規律的作用由于新的規律产生而愈来愈受到了限制。不同的規律的冲突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規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作用，代替它的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規律，它在国民经济的最重要部分中，在社会主义成份中决定了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

質和文化的需要是生产的动力。滿足的程度經常决定于生产的范围和生产力的發展水平，生产力的發展是为了尽量充分地滿足需要。

在簡單商品經濟成分中，价值規律还起着調节生产的作用，在确定价格时它是被有意識地利用的。但是，价值規律的作用在这个經濟成分中也已經由于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的影响而受到了限制。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资本主义成分中同样也还是价值規律調节着生产。由于壟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經濟規律已經完全丧失了作用，剩余价值規律就代替它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然而，就是剩余价值規律的作用，如已經指出的，也由于新的經濟条件而大大地受到了限制。

在西德，壟断资本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在充分地起着作用，并且，就像我們所看到的一样，人民群众的状况不断地恶化，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已經成了占統治地位的規律，它不仅在社会成分中起作用，并且对整个国民經濟的發展都有影响。从而迅速地改善了劳动群众的物質和文化状况。

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形成以及發生作用对于争取德国統一的民族斗争有着很大的意义，因为这样就給全体德国人民指出了走向幸福将来的道路。

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形成了国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并且逐漸开始發生作用。瓦尔特·烏布利希在統一社会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叙述了如何在这个規律的基础上，逐漸有計劃地領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民經濟的發展：

“計劃是以把最重要的大企業，電力、運輸、以及其他一些工業投入生產而開始的。隨後對各個工業訂出供給物資的計劃，直到最後經過自下而上的建設，經過各種經濟部門的經驗總結，就有可能得出真實數字來，這些數字表現在各個季度以及一九四八年的下半年的半年計劃里。這是國民經濟整個計劃的開始。”^①

大家都知道，在這第一個半年計劃之後，接着是兩年計劃，再後就是我們到一九五五年結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隨着我國國民經濟計劃的高度發展，我們愈來愈多地學習利用這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以及適應這個規律的需要確定了國民經濟中的必要的比例。但是我們還沒有有效地充分運用這個規律并把現有的不合比例的情況消除掉。從這裡可以了解，必要的比例並不是簡單地經過正確地制訂計劃，而是經過國民經濟的實際發展而獲得的。

在利用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方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對外貿易也特別重要。我國的經濟科學應該比現在更多地研究對外貿易在擴大再生產中的作用與對外貿易在適應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下的發展。我們的機器製造業、精密光學儀器、化學工業所具有的巨大生產能力，使得為這些工業部門保證國外銷售市場成為必要，而另一方面我們也依賴工業原料和糧食的輸入。對外貿易的計劃同樣是我國國民經濟計劃、生產計劃以及財務計劃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它的實施在極大程度上決定於全部國民經濟計劃保持必要的比例。我國政府已經採取重大措施來改善對外貿易。例如由重工業與機器製造業派遣了二百名優秀的工程

^① “德國統一社會黨第三次黨代表大會記錄”，第一卷，第343頁。

跑到国外市場去研究具体的条件。經濟科学在这方面也不应该落后，它必須对世界市場作科学的經濟方面的研究，必須制訂出科学方法来改善对外貿易的工作，并由此来帮助改善对外貿易。特別是要科学地制訂出在对外貿易中的經濟核算方法。这样，在这个領域上也就能够为获得利潤而进行有力的斗争。进行这一工作的出發点是，工农国家已經掌握了对外貿易壟断权，并且我国对外貿易的主要部分是针对世界民主市場。这一事实使得在对外貿易中利用社会主义經濟規律比較容易。

另一方面，在运用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时，必須制訂出生產計劃，以減少輸入粮食的必要性。

國民經濟計劃是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要求的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具体运用。經濟計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因而社会的指导生产也是非常重要的。使經濟活动有效地进行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正确的計劃，經常与經濟政策任务相适应的，并且是以运用經濟規律为基础的計劃。計劃本身有錯誤或者是以不符合实际的前題为根据的，那么在經濟生活中必然会發生难以抗拒的紛乱，这时就需要在年度过程中改变計劃，这在过去給我們的企業制造过不少麻煩。制訂出計劃是一种極為复杂的科学工作，而且要負重大的責任。的确我們在制訂我們的計劃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這項工作是在逐年地改善着。随着第一个五年計劃的結束以及准备第二个五年計劃，我們已經达到了这一点，即我們必須在改进我国的國民經濟計劃上前进一大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政府简化計劃的決議就指出了这一点。这个問題的几个主要点是我現在要研究的。

政府决策的重点是提高各个大企业的经济活动的独立性。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央的计划就集中在各种最重要的国民经济任务上，并且为了这个目的，还大大缩减了中央计划的项目。各种大企业通过季度计划的执行，就有可能把计划工作更好地和生产的要求和居民的消费相配合。向制订季度计划过渡并不意味着削弱五年计划或年度计划。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具体制订季度计划和月计划来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由于把国家计划限制在最重要的国民经济任务上，因此同时也有必要改进中央计划的方法。这里有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总产量的按值计算的计划是以不变标准价格来实现的，总产量计划的实现也是以不变标准价格来计算的，并且还作为获得奖赏的根据。关于这个不变标准价格已经讨论了多年，大家一致认为现在通用的不变标准价格早已过时，并且成为发展生产的一种障碍。在我面前有着无数荒谬的不变标准价格的例子，现在只需举出一个显著的例子。国营赫特斯德的铜线制造厂厂长班德尔报告说：

“例如我们保持每公斤铜杆的价格为四点二五马克，现在把它轧压为铜线，就变成每公斤一点四八马克，大约减少到三分之一；我们把这铜线再压成二百分之一公厘细的铜丝，标准价格仍然保持不变；但是当把这些铜丝扭成铜绳，它的价格就跌到每公斤一点二六马克。铜绳愈难做愈复杂，不变标准价格愈低。我们制造出一种十分复杂的绳，每公斤只得到零点八八马克，仅为铜杆不变标准价格的五分之一。”

这种情况不仅是这一个企业，许多其他的企业也是如此，经常是标准价格由于附加的劳动消耗而降低了。此外，现有的不变标准价格的差别太小，以致品种的简单改变对完成总生产计划有极大的影响。显然，现有的不变标准价格不能再当作我们计划的可用工具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负责干部，以及我们的经济学家早就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把它弄清楚。即使现在打算将按值计算的计划的生产数量，作为实际纳税价格的商品生产订出来，我们没有不变标准价格或者任何其他不变价格仍然很困难，特别是在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不能这样。在决定这个问题方面我知道是有困难的，因为大多数的实价，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实价和劳动消耗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就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找到理想的解决办法。但是对任何一种解决办法我们都必须迅速地作出决定，因为现在所通用的不变标准价格根本不能再继续用了！

中央的计划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防止或者克服以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粗率的不合比例现象。我们还有许多并非必要的，必须迅速除掉的不合比例现象。我们可以拿合乎规格的工业生产的發展来说，例如螺絲釘和螺絲母。一九五四年对螺絲釘和螺絲母的总需要量为四万三千六百吨，可是我们只生产了二万一千六百吨，因此不得不要有相当数量的輸入，虽然如此，仍然还有人喊着要螺絲釘。这种不合比例的现象只须采取少数的措施就可以相当迅速地消除的，用几架自动压制机，使用相当数量的材料，就能够满足对螺絲釘和螺絲母的需要了。

这种不合比例的现象必须通过中央的计划单位来迅速消除，因为由于不合比例而使国民经济所遭到的损害，通常

在一年中比为消除这种不合比例的情况所需的投資要大。

計劃的生产任务和財政任务之間的关系是直到現在还没有完滿解决的一个問題。实际上有一种意見傳布很广，即認為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計劃，它們應該是相互一致的，但却时常不能一致。这并不是少見的，一个企業的生产計劃改变了，但是它的財務計劃則依旧未改。例如国营罗西茨焦油加工工厂在一九五四年下半年，通过基本化学商会减少了四百万馬克的生产量，但是它的財務計劃却没有改变^①。当然，一个企業不能有两种不同的計劃。企業的財務任务只能由它的生产計劃产生出来。因此在“政治經濟学教科書”中写道：

“每个国营企業(工厂、矿井、国营农場、机器拖拉机站等等)都有自己的技术生产財務計劃，这种計劃根据国家的計劃任务編制出来，是企業的生产技术和財務工作的綜合計劃。”^②

这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企業都是适用的。但是目前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經濟中，在現有的生产計劃和財務計劃之間仍然存在着不協調的現象。第一，这种不協調現象基于制訂这两种計劃的方法及其內容的差异上。生产計劃是按标准价格的总产量的計劃。但这个价值总数不能認為与財務計劃中所包含的指数有关，因为这种指数是在考虑到未結束的生产变动的情况下，以納稅价格来表示的商品生产价值。而这种价值量的确定只是商業部門或財務計劃上的事情。其次，直到現在專業計劃方面只

① “德國財政經濟”，1955年，第5号，第177頁。

② “政治經濟学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9頁。(重點是我加的——弗·厄斯納)

是計劃了技術上的統一，例如冶金產品就不顧其他的產品。但是財務計劃却包括了全部商品生產。只是到了現在，各專業計劃方面在它的生產計劃中才包括了全部商品生產。第二，這種不協調現象基於批准這兩種計劃的時間上的差異。財務計劃通常比生產計劃批准晚得多。第三，這種不協調現象之所以發生，是由於生產計劃變動極大，而財務計劃却比較固定的。這就迫切需要改進我們的計劃，迅速克服生產計劃和財務計劃之間的不協調現象，在一個企業里有統一的“技生財計劃”（技術、生產、財務計劃），把技術發展的需要、生產程序和財務活動都總括到一個計劃內。“德國財政經濟”雜誌在上一期的社論里對這個問題作了研究，但是對這個事情的論述是有些片面的，即“計劃工作者對通過市場來檢查生產的重要性給予的評價還太低。”^①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同樣正確的是，當企業要求批准財務計劃或指出計劃不能執行時，財政機關經常就犯重听了。應該像社論所提出的完全正確的要求一樣，由兩方面來安排這件事情。

由於簡化計劃的決議，各個主要機構，特別是企業都得到了較大的獨立性，因而對它們的計劃也負了較大的責任。因為他們要對自己產品的銷售負責，所以他們將來不僅要和商業部門更好地合作，而且要比現在更好地應用合作制度。在消費品工業里，與消費者訂立合同應該成為制訂生產計劃的基礎。如果做到了這一點，那麼許多中途改變計劃的情況就不會有了。直到現在我們的情況正好與此相反：上級下令改變計劃，常常要求已經訂立的合同也改變。對於

① “德國財政經濟”1955年第5期，177頁。

这一点可以举一个例子：国营艾尔夫特城的保尔谢弗尔制鞋厂，在一九五四年总共訂立了二、七五四个销售合同。到十月底这些合同中就有一、二二〇个改变了。在四八三个供应合同中，到十月底也改变了一八六个。这个国营制鞋厂的领导在解释这种情况时叹气說：“我原以为我們是在制造鞋子的，可是实际上我們却在制造合同。”国家合同裁判所的一次調查証明，企业本身要求变更合同的数字比由于政府采取措施所引起的变更和取消合同的数字要少。希望随着简化计划的决議的貫徹在这个方面也能有很大的改进，从而使企业的生产过程不会間断。由于将来在这些企业中着重实行季度计划，在这一方面也会减少困难。

因为企业对自己的企业计划要完全負責，所以这些企业计划的质量也要由自己来改进。这些计划必須以正确的材料与劳动力的決算为基础。而这一点只有在企业內有了正确地、科学地計算出的而且是先进的标准才有可能。沒有精确的标准就不可能有精确的企业计划。如果沒有精确的材料消耗标准，那么材料需要计划就只好按照經驗或“用大姆指来測定”了。在最近几年中，我們对确定标准問題是有进步的，但还不能令人滿意。使用机器、电力和材料消耗等标准的科学計算，在长时期內，仍然是改进我国计划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对于这一点有一个例子：

重工业部报告說，大約有百分之九七的原料合乎材料消耗标准，这显然是一个良好的情况。但是又說明，这个数字包括三种不同的标准：1. 有技术根据的标准，2. 經驗統計的标准，3. 在刚开始生产时，以利用其他企业的資料为基础的標準。实际情况是，在电力、煤气和人造織物方面只有經驗統計的标准；在鋼鐵工业中，有技术根据的标准和經

驗統計的标准的比例是二一比五四九。在重工業化学方面,同样的比例是九一比一、四五二。在总数八、〇八九个材料消耗标准中只有六六七件有技术根据,而有七、二五八件是經驗統計的标准。

当我们說到标准是精确計劃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时,当然我們經常是指有技术根据的标准。这种标准是和先进的生产条件相适应的,它督促企業动員一切潜力并以各种方式节省社会的劳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民經济計劃不仅包括社会主义成分,而且牵涉到其他成分。例如每一个农民都有耕种計劃和飼养牲畜計劃,此外还有义务上繳农产品的計劃数字,这些主要是用来规定他的生产計劃的。这种对于私营农業生产的干涉,在过去和現在都是必要的,为了人民的粮食,必須保証绝对需要的农产品的生产。这种干涉在原则上是有效的,而且对农民是有利的,因为这种干涉保証了农民产品的銷售。这种农業生产計劃的缺点在于:好事做得太多,不必要地限制了农民的經济創造性。例如国家計劃中的耕种計劃包括了一百种以上的各种作物,这是由中央机构計劃的,因而对各个农民經營作物的規定,有时达五十种至七十种,这就大大限制了农民生产的創造性,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在国家利益和农民物質利益之間引起了某种矛盾。农民的理想耕种計劃,在这种过度集中化的情况下,是很少得到充分照顧的。可是这种方式的計劃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因为这样集中化的計劃,对各个地区天然的和經济的生产条件当然就不能很好地照顧。这种制度对于公共利益有着怎么样的害处,可由下列例子来証明:罗斯托克行政区一九五五年規定每头母牛的平均产奶量为二、九〇〇公斤。罗斯

托克行政区又把它机械地分配到各个县。这样，格雷费斯米倫县在一九四五年早已平均达到了二、九〇〇公斤，又再得到只有二、九〇〇公斤的計劃任务。

农業生产計劃中的形式主义使天然的生产潜力不能被充分地發掘出来，而且不能把农作物和牲畜的生产計劃互相协调起来，因而使按比例發展的規律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規律受到了妨害[⊖]。

要改进农業生产計劃，就要对天然的和經濟的生产条件，制訂出精确的科学的参考資料，通过限制最主要的产品来簡化計劃，同时在农業中推广合同制度，以及提高計劃干部的質量。关于价格問題我在以后再講。

虽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私营工業和手工業企業沒有經營計劃，它在生产中同样也受到国家計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行政区和县的委员会以及工商会来發生的。私营企業向这些机构提出它們的生产供給計劃，而这种供給計劃要受到与总的經濟任务相适应的影响，以便生产更多的人民群众的必需品，更多的貴重出口物資，更多的建筑材料和工業新产品等等。私营企業的計劃草案由行政区委员会使之和增长速度的控制数字以及和材料的增长（国家的限額和地方潜在力量）相平衡。行政区委员会把控制数字和材料限額交給工商会的行政区理事会，由它負責保證完成国家的任务。

私人資本主义工業与国民經濟相联系的重要方法，是国营工商業企業和私营企業訂立合同。国营經濟支配着大量的物資，而大部分私营企業只是給这种物資加工，因此国

⊖ 現在已經廢除了饲养牲畜計劃，并且准备廢除耕种計劃。保留采購和收購計劃，这就是說，用市場生产計劃来代替总产量計劃。

营成分手中掌握了有效的經濟杠杆，来影响私人資本主义企業，并排除它的有害因素。但是这种杠杆显然沒有被国营經濟充分利用。只有这样才能說明私营企業为什么拒絕參加合同接受供应条件，拒絕遵守履行合同的期限，以及拒絕規定在不履行合同的条件下，要受到处罰。目前我們共和国的情况是，私营企業遇到履行合同有困难，比国营企業所处的情况要有利很多，因为它沒有強制的協定。这种情况是荒謬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国营經濟的干部还不了解，这个最重要的經濟杠杆是完全掌握在他們手里的。

最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私营企業通过一般的商品流轉和工农国家的財政政策，总是要处在社会主义經濟的影响下的。由于这一切情况，資本主义成分的竞争和生产無政府状态的規律大大地失去了效力，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作用却超出了社会主义成分之外。①

正如“政治經濟学教科書”所指出的，实际上各种計劃并不是时常和国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規律的要求相符合的：

“当違反了这些要求时，由于国民經濟各个部門的比例失調，由于正常的生产和流通过程遭到破坏，国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便显露出来。”②

这对于發展社会主义所作的規定，当然在更大的範圍內适用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內还存在的經濟。如果把我們的經濟和西德比較，我們就可以确定，我們已經大大地縮小了竞争和生产無政府状态規律的作用範圍，我們把这个規律的作用，失業和危机从我們的

① 由于工农国家参加了各个私营企業，給这种作用产生了一种新的情况，这种情况需要进行詳細的分析。

② “政治經濟学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頁。

經濟中排除出去了。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過渡時期內是有商品生產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商品生產的必要性是由於有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不同的經濟成份的存在而產生的。它是非常需要的，因為個人需要的物品都是作為商品來生產和銷售，最後，在對外貿易中就是買賣商品的。

哪里有商品生產，哪里就有價值規律。價值規律的作用使得貨幣成為必要。貨幣仍然是價值的一般尺度——整個社會生產的產品都是以貨幣來表示的。因而貨幣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最重要的經濟工具之一。

我國經濟學界對於價值規律作用的討論，常常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錯誤，而使對這個複雜問題的了解更加困難。

大家都知道，按照馬克思的話來說，價值就是勞動，就是私人生產者的勞動，這種勞動應該認為是社會性的勞動，是社會全部勞動的一部分。在社會主義生產中，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已經消除。勞動不是私人的，而是直接的社會勞動。目前有些經濟學家即由此推論出一種在利用價值規律中的自動主義：勞動只需要加以計劃，它就作為直接的社會勞動而創造價值了。例如萊比錫的約翰尼斯·史密特這樣寫道：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勞動力一開始就計劃好了，它是直接的社會勞動。在這裡表現了價值規律的自覺運用。”^①

但是，如果計劃錯了，或者勞動力生產了所謂超計劃的部分，而完全銷售不出去，那會怎麼樣呢？顯然，在這裡，個人勞動並沒有被當作創造價值的社會勞動的一部分，而是

① 約翰尼斯·史密特：“經濟核算與征稅”，“經濟問題討論文集”，第七分冊，第29頁。

無謂地消耗了。因此我要說，即使在社会主义經濟中，价值規律的利用也不是像人們有时所想像的那樣自動地進行的，而是要求有計劃地分配社会劳动，这种分配是和国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要求相适应的。

与此相反的另一個錯誤，在我們的經濟學界中也不是少見的，就是高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經濟中的价值規律的基本的調節作用。我想在这里舉出荷斯特·齊默曼的“居民貨幣收支的決算”一書為例。齊默曼斷言，居民間的貨幣流通是受价值規律調節的^①，即“現金在一方是企業，另一方是居民之間流動”是基於价值規律的作用的^②——國營企業對工人支付工資也是一樣——以及其他等等。顯然，齊默曼高估了价值規律在我們共和國經濟中的自發作用，而沒有充分地估計到許多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是限制了价值規律的作用範圍的。

當然，价值規律在商品流通中，還在一定範圍內起着調節的作用。在各種商品的供給與需求之間起作用，而商品的供給與需求則依價格而定。但是就是在这里——在流通範圍內——价值規律並不能自由地發展，因為，社会主义成份按照固定價格大量地供應商品。即使在農民市場上，本來是自由定價的，但國家的固定價格也擴大了它的影響。

在簡單商品生產成份中，价值規律作為生產的調節者起着作用。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內，它的自發作用被限制在十分狹隘的——可以說是過於狹隘的——範圍之內。因為生產力的分配，例如在農業中是以耕種計劃和飼養牲

① 荷斯特·齊默曼：“居民貨幣收支的決算”，“經濟問題討論文集”，第15分冊，第68頁。

② 同上書，第72、79頁。

算計劃為根據的，並不是自發地通過價值規律。凡是我們不了解正確地運用價值規律的地方，那里雖有計劃，還會發生紛擾。

在我國經濟的資本主義成份中，價值規律作為生產的調節者的作用稍為大些。資本家在我們這里也是為了利潤而生產，並且努力生產能夠獲得最高利潤的商品。即使是對這個成份，工農國家仍然要借助於它們的經濟杠杆加以干涉，因而限制了價值規律的基本作用。

價值規律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經濟的主要意義，在我國發展的現階段上我認為是經濟核算的應用，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成份中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以貫徹節約，並爭取所有社會主義企業的利潤。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第二十一次全體大會正是把這個問題——爭取和提高利潤——作為所有經濟措施的核心。目前它是我國經濟政策的最重要的環節。但是，如果我們不學會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我們怎麼能掌握這個環節呢？瓦爾特·烏布利希在第二十一次全體大會上說：

“當經濟核算利用價值規律時，它就顯示了這種可能性：精確地計算，忠實地記賬，以及經常地檢查企業的經濟活動。”^①

生產成本的精確計算，正是利用價值規律來推斷物化勞動和活勞動的消耗，這是獲取利潤道路上的第一個決定性步驟，這是清算賬目以及檢查的絕對前提。

與此相關聯的，我們就不能放過古爾特·台希曼錯誤的而且對我國經濟政策有害的理論，他在研究社會主義的價

^① 瓦爾特·烏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學問題”，第10—11頁。

值的形成中虚构了一个所谓计划价值。台希曼的这个计划价值的涵义如下：

“计划价值无非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产品的、用价格形式来表示的、有计划的生产费用。”^①

台希曼十分明白，他的计划价值是和客观价值不同的，这种客观价值的大小，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以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的。台希曼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强调说：“各个商品的客观价值愈来愈会失掉它的重要性”。只有在一切价值的总数中，他才承认客观价值。台希曼的理论无非是重复了主观唯心主义所表述过的。如果运用他的理论，必然彻底地消灭了经济核算和任何精确计算。台希曼完全忘记了斯大林的重要指示，即考虑到价值规律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可以教会经济工作人员：

“……计算生产量，精确地计算生产量，并且同样精确地估量生产中的现实事物，而不去侈谈憑空想出来的‘大概数字’”。^②

价值规律在新的条件下也不失掉它的客观性，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中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是在我国其他经济成份中正确而有效地运用这个规律的前提。正确地在社会主义成份中运用价值规律就是说，借助于它来精确地确定社会劳动的实际消耗，并相应地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来正确分配社会劳动。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实现要求系统地并且迅速地

① 古尔特·台希曼：“关于国内贸易的经济学”，“经济问题论文集”，第5分册，第59页。

②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页。

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束缚解开后，在社会主义中就产生了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经济规律并起着作用。这个规律对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具有非常的重要性的，就如列宁所教导的，劳动生产率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主义，因为它创造了比封建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虽然在资本主义中，因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由于危机和倒退是间断的。社会主义将战胜资本主义，因为它创造了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新的经济规律。

当然这个规律也不是自发地发生作用的。并不是我们袖着手就能够看到这个规律是怎样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恰巧相反，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规律正是要求我们为争取它的实现而积极斗争。这个斗争的前提就是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这个规律。

应该承认，对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实质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是清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在产品中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而过去劳动的份额相对增加，但包含在单位产品中的劳动总量减少了。”^①

这个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公认的论点驳斥了汉斯·海塞尔在“经济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所代表的见解。他认为，物化劳动的份额对活劳动份额的减少也表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海塞尔写道：

①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8页。

“毫無疑問，那種共同的規律性對於這種比例是有作用的，它將無疑地會影響總產品中的物化勞動的份額提高。但是這方面也不能忽視其他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影響着總產品中的物化勞動的份額不斷降低：這就是我們的工人，他們不斷地在爭取節約材料，減少機器的損耗，用廢物來製造貴重的消費品等等，並且在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績，因而使物化勞動的份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五年計劃的過程中不斷地降低了。”^①

我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產品價值中的物化勞動份額的確是降低了，在我面前的這些資料是很不精確的，但還是說明了這一點。然而海塞爾的說法是錯誤的。他想把壞事說成是好事，從而維護了落后和懶惰。的確，節省物化勞動，節約材料，注意保護機器等等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一個附加的因素，但決定性的因素是節省活勞動，是以同樣數量的活勞動的消耗生產出更多的產品，而這通常是需要更多地花費物化勞動和更好的生產工具的。如果在我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出現的是一種相反的情況——而這在許多工業部門的確是發生的——那末這只是說明正是從活勞動方面所達到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不夠的。無可爭辯，在我們這裡勞動生產率沒有和技術的提高保持一致的步調。舉例來說，假如推行一種新的技術，但沒有同時實行相應的新的工作定額，這樣就缺少對節省活勞動的督促，並且也就可能會發生海塞爾所維護的這種情況了。

馬克思所指示的，產品價值中的活勞動份額減少的情況一定會出現，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改進技術，運用

① 漢斯·海塞爾：“關於社會生產中兩大部類的增長速度的問題”，《經濟科學》，1954年版，第0冊，第654頁。

最新技术和最新科学工作方法是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性的手段。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使生产力从资本主义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枷锁里解放出来。逐年都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来发展以最新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与此相关联的我国国民经济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是投资的效果。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更廉价地制造新的生产设备,避免不必要的设计费用,在各个方面降低工程造价。例如由于仔细地审查了煤炭工业的投资计划,结果立即就可以从两亿马克中去掉六千六百万马克,而并不降低投资的效果。另一个任务在于,执行一种能够使新设备尽量迅速地投入生产的投资政策。如果同时开始许多长期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有时连续几年完成不了,这样就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损失,并且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生长。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为此已经为它创造了“投资的废墟”这个名词,这个名词是对我们的投资政策的一个严厉的但是公正的批评。应该做到,使比较少量的投资项目在短时期内结束并投入生产。这不仅适用于工业,而且适用于一切投资。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另一重要手段是改善企业中的劳动组织,特别是物资供应和协作企业的合作。断续的生产是会使劳动生产率降低的。到目前经常出现的实际情况是,到月末、季末和年终时就以加班加点来完成计划,然而到下一阶段开始时,生产由于缺少材料而陷于停顿,这种情况严重地妨害了劳动生产率的生长。由于简化计划的决定使企业也就有可能不断地无阻碍地进行生产。

然而,如果没有精通技术和组织的人,那末改进技术和劳动组织也是空谈。马克思说,在这些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中占首要位置的是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这并不是偶然

的。工人的業務知識，而最根本的群眾的文化水平是決定勞動生產率的重要因素。同時，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又關係到勞動群眾的認識問題。勞動群眾的新的認識表現在爭取完成生產計劃，提高勞動產量，降低成本，改善質量等等的社會主義競賽的廣泛的運動中。社會主義競賽是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最重要的杠杆。絕對不能把競賽只是限於完成生產計劃，競賽必須涉及所謂的計劃的質量指標，涉及生產的質量，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潤。目前工作中的缺點也在于，這種競賽經常由個人義務代替了，而對這種個人義務的實現很少進行檢查。個人義務還不是競賽。這就必須組織有具體任務的企業對企業、小組對小組而主要的是個人對個人的真正的競賽，同時規定嚴格的檢查。

工作定額對於爭取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有重大意義的。先進的有技術根據的工作定額的意義在於，要使工人從物質利益上來關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通過組織同志式的幫助所有的工人就可能都完成規定的定額並且還超過一些，從而使生產率得到普遍的提高。規定有技術根據的先進的定額不僅為制訂精確的勞動力計劃所必需，同時它也是利用勞動生產率不斷增長的規律的前提。不正確的、太“軟弱”的工作定額，即使技術發展，也是阻礙規律發生作用的。如果在各個工業部門，例如在汽車和拖拉機製造業中，平均完成了工作定額的百分之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那末，不用進行任何詳細分析就可以說，這裏的定額是不正常的。此外，各個工業部門中完成定額的平均數字是很不一致的。消費資料工業完成百分之一百另五到百分之一百十，電機和工作母機製造業是百分之一百三十五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五。在這方面應該注意到，這裏指的是工業部門的平

均数字。而在各个企业间和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间还有着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也就说明了，在我们这里，工作定额还是不正常的。

引起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可以到这里来找，即在我們的社会主义工业中有技术根据的工作定额还总是太少。在机器制造工业部系統内，在一九五四年年底有技术根据的工作定额只占百分之二十六。在重工业部系統内，在一九五四年年底有技术根据的工作定额占百分之三十六，预先规定时间的定额占百分之三十一。也就是在这个部里有一些企业平均完成了定额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到百分之一百六十五。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十一次全体大会再一次着重指出，制訂有技术根据的工作定额是提高利潤的前提。

引起过高地超过定额的另一原因是，对于完成定额实际消耗的工作时间沒有精确的檢查。这种情况也不少，即为完成定额实际进行工作的时间是作为等待时间来记录的，因此完成定额的时间算得太短，完成定额数字就大大地提高了。这种“定额的搖摆不定”严重地妨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須迅速通过严格的檢查，特别是工长的檢查来消灭它。

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仅仅决定于一种新技术的推广是錯誤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而且應該通过改善对现有技术利用，特别是改进工作时间的利用来达到的。正是在这方面，在我国的国营經濟中还有着巨大的潜力沒給發掘出来。加强劳动紀律，反对磨洋工，增加产业工人对職員的比数在这里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只要减少所有各种为与生产無关的工作而使用的工作时间，就可以大大地提

高劳动生产率。

为使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能够有效地进行，必须要有稍微精确些的对劳动生产率的测定。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当然是根据使用价值来测定。例如，蔡兹氮化工厂一九五〇年时每个生产工人生产的輕油为一五点六吨，一九五四年是一六六点六吨，这样很清楚，我们是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一。但是在生产各种各样机器和工具的机器制造业中，情况就要复杂得多。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情况还更要复杂。在这里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是用按标准价格计算的总产量除以当时组内的工作人员数来进行的。这种计算方式至少包含有两个不可靠性的因素。首先，总产量的概念绝对是不清楚的。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九五三年曾进行了一次讨论，在这次讨论中虽然有許多人开了炮^①，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弄清楚。其次已经证明，目前所有的标准价格都不是可靠的见证人。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所分析的社会主义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数字就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明力了。在这方面也必须很迅速地改进测定的方法。而我们的经济科学工作者们在最近几年中正是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很好的理论上的准备工作，因此我认为，立即改进方法的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

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过渡时期的条件下，这个规律仅仅在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成份中才起作用。由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工业的大力帮助，这个规律也已经在小商品生产成份中，至少在农业中发挥它的作用了。在我

^① 参看馬尔加加德·施密特“在统计工业总产量中的问题”，“经济问题讨论报告”，第12册，第27页。

国的条件下，这个规律也使个体农民在他们的私有经济中有可能，通过全面地利用国家的帮助而不断地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而在这一方面用各种办法来帮助他们也是我们的任务。当然，这个规律在这个成份中是不可能像在社会主义成份中那样充分地发挥其作用的，然而这个规律在小农经济中的利用和在利用这个规律中所暴露出来的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将是使个体农民相信社会主义大经济的优越性的另一个办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规律的愈益增大的作用是我們争取德国恢复统一的民族斗争中的一个巨大的积极的因素。在西德，提高劳动强度来加强剥削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手段，这种提高极不平衡，随之而来的是人民群众的状况愈益恶化，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生产率在新技术、更完善的生产方法和工人的文化和业务知识增长的基础上，得到了逐步的不断的提高，同时劳动人民的状况也不断地得到了改善。在这里也就显示出我国新的生产关系的优越性。

在过渡时期产生并扩大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新的分配关系。这就发展了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使它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中的工资政策的基础。在这方面利用了劳动人民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原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道：

“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要求直接按每个工作者的劳动数量和質量来分配产品，要求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不分性别、年龄、种族和民族，一律实行同工同酬。”^①

①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3页。

运用这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基础是，劳动力在国营成份中已经失去了它的商品性质，并且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消灭。工资成了用货币来表现的社会总产品的份额，它按劳分配给劳动者供个人消费。工资的货币形式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使工资能够根据劳动量而有足够的差别。在社会主义成份中，劳动工资有着各种形式，如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奖金，这一切形式都是符合于或者应该符合于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哈利·马特斯因此在他的著作“劳动量原则是国营经济中支付工资的基础”中建议，“按劳动量计算工资”这个概念不再是从以往通常的计时工资、奖励工资相区别的意义上运用，而是以此来表示在国营经济中工资的实质已经改变了^①。虽然这个建议本身从理论方面来讲是有些道理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劳动工资的性质和资本主义的是有原则上的区别的，但是我不认为马特斯的建议是可以采用的，因为他抹煞了社会主义中各种工资形式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对于利用按劳分配规律正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区别之被抹煞是在马特斯解释“按劳支付工资的最低级形式是计时工资”^②的时候。的确，计时工资可以说是最初形式，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还不是。发展我国工资制度中的主要任务在于尽可能广泛地用计件工资来代替计时工资，这种计件工资在我们这里被称为真正的计劳动量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把计时工资解释为计劳动量工资这只会引起混乱，而离开了主要任务。

在说明过渡时期的劳动工资的性质时应该考虑到，按

① 哈利·马特斯：“劳动量原则是国营经济中支付工资的基础”，柏林1954年版，第7、80、153页。

② 同上书，第80页。

劳分配的規律即使在社会主义成分中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實現的，因为有旧的工資制度存在，这种工資制度大多数是几十年来階級斗争的結果，并不是一下就可以廢除的。这样，我們在国营經濟中作为一个資本主义的繼承者还带着旧的地方等級制度的残余，这种残余显然是和按劳分配的規律不相容的，但是只能逐步地加以消灭。充分利用按劳分配規律的基础在原則上是清楚的，但也只能慢慢地、逐步地建立起来。

与工作能力、劳动繁重情况和責任以及各个生产部門的国民經济意义相适应的劳动工資的差別是通过工資率制度和工資等級來實現的。为使这种差別真正符合于按劳分配的規律，就有必要实行工資等級表，在表中明确規定各个工資級別的工作特点。因为我們今年（一九五五年）才能开始逐漸实行經濟部門的工資等級表，所以目前在我国的国营經濟中还存在着一種經常和按劳分配的規律起冲突的定級制度。

在工資等級表的基础上，必須在考慮到必要的差別的情況下規定各个經濟部門中的每一个工資等級的基本工資。就在這一點上，我国的經濟中还存在許多違反按劳分配規律的情況，特別是在支付貿易工作人員和技术人員的工資時，對於這些人員沒有統一的、具体的工作特点，而且在各个經濟部門中的工資等級數字竟在四和十四之間變動！因此在實際工作中任意地規定薪金的情況并不是少見的。

目前和計劳动量原則截然相反的情況往往是，工資等級比較高的工人的平均的按劳动量的工資比工長的工資高，而這些工人是在他們的管理範圍內工作的。

而且各个工資等級中的差別在一些工業部門中也甚不正常的，特別是，就如馬特斯所指出的，在建築部門和造紙部門中。例如，在建築業中，工資等級五級和六級之間的差別是二四个分尼，而在工資等級七級和八級之間的差別只六个分尼。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造紙部門，精製陶器業和玻璃工業部門中^①。

如果有了正確利用按勞分配的規律的基礎，那麼也就可能根據這一規律的要求來規定企業集體合同中的具體條件。

然而一個拿按勞動量計工資的工人的實際收入不僅根據他的按工資等級的基本工資，而且也根據他完成工作定額的情況來確定。從這點來講，如果定額不恰當，那麼即使工資率制度完全正常，也會損害按勞分配的規律。在一九五三年工資等級一級到四級的工資提高後，我們在造紙工業中發現，工資等級三級和四級的工人由於完成定額較多，收入比因為在大型制紙機器旁操作而只能超額很少的工資等級五級和六級的工人要多。為了不致損害按勞分配的規律，必須經常研究各個工資等級中的定額完成情況。

工作定額並沒有按工作質量來區別勞動工資的國民經濟的職能。這是通過工資率制度來實現的。工作定額的目的是盡量正確地按每個工人實際進行的工作的數量和質量來區別工資，並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裡應該注意到，在工資率制度中確定的差別不會由於定額錯誤而和它相反的。在檢查定額完成情況時必須特別注意到產品的質量也要符合於規定的條件。

① 哈利·馬特斯：“勞動量原則是國營經濟中交付工資的基礎”，柏林1954年版，第73頁。

如已經提到的，在不可能實行按工作定額的計件工資的情況下，計時工資通過獎金來彌補。即使這樣，計勞動量的原則在過去還是經常遭到破壞，那就是機械地按固定的計劃而絲毫沒有考慮實際的勞動量來分配季度獎金。由於部長會議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作出關於支付國營企業中的工程技術人員、工長和營業領導人員的獎金的決議，在這一方面將來也會更好地符合於按勞分配的規律。

實現按勞分配的規律必須和任何平均主義的作法作堅決的鬥爭，使得每個人真正取得符合於他的勞動量的報酬。但是它也堅決要求工資和薪金有一個正確的差別，它要求同樣的勞動量取得同樣的工資，比較高的勞動量取得比較高的工資。而這個要求，就如我所指出的，在我們的國營企業經常是被忽視的。例如，在同樣的企業里對於同樣的工作卻有不同的定額，因為一個先進小組決定“自願提高定額”，這完全是不可許可的。如果變更定額，那末就應該對所有從事同樣工作的人都有關係。

不論性別、年齡、種族和民族，同樣的勞動取得同樣的工資的原則在我們的國營企業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實現。

勞動工資和勞動生產率之間有着緊密的相互關係。勞動生產率的不斷增長是不斷提高工資的基礎。這種關係必須經常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優先於工資的增長，否則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發展。

目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勞動工資的情況如何呢？在這種企業中的工人處於一種特殊的地位，這種特殊地位只有從過渡時期的條件中才可能理解。這些工人一方面是屬於占統治地位的工人階級，是社會生產資料的共有者。而另一方面他們還是把他們的勞動力作為

商品出賣給私營企業主，承受剝削和生產剩餘價值。如果否認了資本主義成分中的工人還是把他們的勞動力作為商品來出賣的，這就是否認了這個成分的資本主義性質，因為把勞動力作為商品購買是把貨幣變為資本的決定性的條件。但是，雖然在這個成分中的勞動力還是一種商品，它的價格，即勞動工資，卻不再由資本主義工資規律來決定，而是受新的社會關係影響的。由於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不再存在產業後備軍和周期性的發展，為決定私人資本主義成分中的工資產生了新的經濟條件。就如馬克思所說，在這種工資里也摻入了道德的和歷史的要素。社會主義成分中的工資關係，工農國家的法律規定以及工會力量使工人的要求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得到了實現，它們對於資本主義成分中的工資起着巨大的影響。因此私營工廠中的工資比相當的國營企業的工資只低很少。至於實際工資，私營工廠的工作人員從降低價格等等方面享受著和所有其他居民同樣的好處。資本主義貧困化的規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資本主義成分中也已經失去了它的作用^①。

在農業方面，按勞分配的規律已在農業生產合作社中運用，收入的最大部分（第三種類型社是百分之八十）按所做的勞動單位分配給合作社社員。在合作社的收入中也還存在一種級差地租，這是由於土壤的肥沃程度不同或位置有利而產生的（級差地租 I），或由於追加投資而產生的（級差地租 II）。一部分級差地租由國家用有差別的義務上繳的辦法根據土壤等級抽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因為還存在着土地私有制，所以也還存在一種絕對地租的形式，這種

① 由於工農國家參加了各個私營企業，對於這些企業中的工人也產生了一種新的情況，這種情況同樣也還需進行經濟分析。

地租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是根据入社的土地份额分摊的。绝对地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继续存在是和土地的私有制的继续存在有直接联系的，由于制定农产品价格的复杂性产生了一个困难的經濟問題，这个问题要求进行一种彻底的科学分析。确实，这件事情并不像汉斯·鲍歇尔特所说那样简单，他的結論是，由于土地占有者和直接生产者的分离的消除，在农民經濟中的绝对地租也就不存在了^①。在任何情况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地租和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地租是有原則上的区别的。发现它們的特殊的社会內容，将是一种理論研究的最重要的任务。

按劳分配的經濟規律是不断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的基础，它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产生和发生作用进一步地证明了新的社会关系比在西德重新建立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关系优越。

过渡时期的复杂問題之一是国民收入。这里就不能只限于研究社会主义成分，因为在創造和分配国民收入方面是有一切成分参加的。一般來說，国民收入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补偿了所消耗的生产資料后剩余的，它体现着新消耗的劳动。国民收入只是在物質生产領域内才被創造出来。而物質生产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包括現存的三个經濟形式的。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民收入是由下列几个部分构成的：

在社会主义成分中是归自己的劳动产品以及归社会的劳动产品；

^① 汉斯·鲍歇尔特：“卡尔·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及其在各个不同經濟形式中的运用”，哈勒—威丁堡，馬丁·路德大学科学杂志，1951年至1953年，第6册，第232頁。

在小商品生产的成分中是农民和手工業者的剩餘物，只是这些剩餘物并非由于服务而产生的。

在资本主义成分中是可变資本和剩餘价值。

国民收入的多少决定于生产的領域和生产率的水平。因此，扩大国民收入的手段也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从事物質生产的工作人员数字。在社会主义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扩大国民收入的决定性的因素。

国民收入按其实物形式可以分为消費基金（这是用作消費的）和积累基金（这是用作扩大生产或其它投资的）。

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直接交給它的直接生产者手里——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就是把工資交給工人的手里，把剩餘物交給农民和手工業者的手里，把利潤交給資本家的手里。一部分国民收入以稅收或上繳的形式交給国家。此外，社会主义企業的贏利也归国家所有。

集中在工农国家手中的这部分国民收入是按照社会主义的基本經濟規律通过党和政府的決議来分配的。这里必須注意到，即使留在直接生产者手里的一部分国民收入，也是通过工資政策、价格政策和稅收政策受統一分配約束的。

分配国民收入的最重要的工具是国家預算。国家預算收入的主要来源是：1. 社会主义經營的收入，这不是作为生产上繳就是作为利潤提成而繳入国家預算，即国家集中的純收入；2. 由其他成分和居民交納的稅款。

国家預算的主要任务包括供給国民經濟、社会文化設施、国家行政机关和国防建設以資金。

最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財政政策方面进行了几項重要的改革，以便促使企業利潤的提高。这些改革所涉及的，首先是推行和产品相关的有差別的生产上繳，特别是在消

費品工業中，它所要達到的目的是使任何產品的製造都獲得利潤，和加速把歸社會的這部分產品上繳國家。其次是允許歸社會的產品的另一部分作為企業純收入（贏利）在企業內部完成企業的投资任務，補償流動基金和充作經理基金，以使全體工作人員從物質利益上關心完成贏利計劃。

在和國家預算密切關聯的社會主義成分中存在着社會主義的財政制度。它的產生是由于，一切社會主義企業的生產品都是以前價格形式來表現的。社會主義財政制度是按計劃構成和分配貨幣基金的一種涉及面很廣的制度。由此就產生了進行財政控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通過馬克來控制。這種控制在企業內是通過會計制度來實現的，即通過對比支出和收入，以確定每一件產品的費用，并使計劃費用和實際費用相平衡。對於企業的通過馬克來進行的控制，總會計師負有主要的責任。其次，合同制度中的財政控制通過相互檢查而得以實現。再其次是由德國發行銀行借助於短期貸款、現款流通和無現款的結算來進行財政控制。由於發行銀行控制企業的財務活動情況，它就有可能迅速發現生產過程中發生的困難。另一個控制工具是國家的財政機關，由它們控制流動基金和利潤，最後是由德國投資銀行控制投資消耗和折舊基金。

貸款是促進社會主義生產的重要手段。它的主要作用在於，動員一切從社會基金循環中產生的暫時空閑的資金，並為社會主義再生產進行分配。因而貸款就成了檢查國民經濟計劃中規定任務的完成情況的重要工具。

在社會主義成分中，企業的財政控制由部的機構、國家預算和發行銀行直接進行。但是如果這種控制沒有成為勞動群眾的事情，那麼這種控制也是不夠的。因此瓦爾特·

烏布利希在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第二十一次全體大會上要求，企業中的黨和工會組織不僅要從事完成生產計劃的工作，而且也要檢查財政計劃的執行情況。上述的財政政策方面的新措施保證了勞動者從直接的物質利益上關心財政計劃的完成。現在的任務是在於，幫助勞動者正確地了解財政政策問題，這個任務也是經濟科學工作者必須共同擔負起的。

在這兩種私營經濟成分中，通過馬克進行控制只可能是一種間接的控制。除了通過國家稅務管理機關控制外，發行銀行還可以通過使所有年營業額超過二萬馬克的企業必須開立銀行帳戶和從它們的銀行里取得現金限額的規定來進行控制。所有超出限額的資金必須交付給銀行。由國家銀行檢查這一規定的執行情況。

對私營企業的另一種控制是通過短期貸款來進行，這種貸款是私營企業大規模生產和流通所需要的。這種貸款的許可受一定條件所約束——生產要合乎國民經濟的利益，貸款用途的限制，擔保，按期歸還及其它——，由銀行檢查條件的履行情況。

最困難的是在小商品生產者中實行財政控制，因為這些小商品生產者並沒有開立帳戶的義務。只有在這些企業需要短期貸款時，才可能進行財政控制。雖然可以對這些企業作某些有關國民經濟計劃方面的控制，但如前所述，這種控制幾乎不能對於這些企業的財政管理有所約束。

國民收入的分配和社會再生產問題有着直接的关系，因為把已經知道數量的國民收入分為消費基金和積累基金直接決定了積累的速度，即決定了擴大社會再生產的速度。社會再生產的問題只有在馬克思所闡明的再生產理論的基

础上才能得到解决，就是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以及根据馬克思所闡明的規律，即在价值补偿与物質补偿的必要性上才能得到解决，即使这项价值仅用于計算目的。

再生产理論的主要問題在于生产資料生产(第一部类)同消費資料生产(第二部类)的比例。馬克思所提出的扩大再生产的規律，即 $I(v+m)$ 必須大于 IIc ，适用于任何一种扩大再生产，适用于資本主义的以及共产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同样也适用于过渡时期。除去为了克服不合比例的暂时例外情况之外，这个規律始終都在發生作用，即在扩大再生产时，生产生产資料的第一部类一定要比第二部类較快地增长。

虽然这个規律被認為是馬克思主义的原理，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还有一些經濟学家特別是联系到新政策的实施时，竟对这个規律加以否定，而断定，如果第二部类即消費資料生产的增長比第一部类快，扩大再生产也是可能的。

早在一九五三年汉斯·海塞尔曾經發表了一本小册子“国民經濟計劃中的決算”，即曾显露出他对馬克思再生产理論的了解是不足的。首先，海塞尔不是同馬克思一样从把总产品分成两个部类出發，而从价值构成的 $c+v+m$ 出發，然后再研究两个部类，在处理两个部类之間的关系上，海塞尔也和馬克思相反，不是把第一部类，而是把第二部类置于领导地位。最后，海塞尔得出結論：

“第一部类的增長和第二部类的增長之間的發展比例必須是这种情况，即第一部类暂时地比第二部类增長得快。”^①

显然这个“暂时”是意味着通常第二部类应该增长得快些。

一九五四年年底，海塞尔在“经济科学”杂志中进一步发挥了他的“理论”，他的主张是：

“第一部类的优先发展绝对容许第二部类更快地增长。”^①

在另一个地方他综合了他的说明并写道：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第二部类比第一部类增长得快，社会扩大再生产还是绝对可能的。”^②

汉斯·海塞尔的这种见解显然是和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相矛盾的，并且歪曲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实施的经济政策。

一九五四年八月在“实用统计”杂志开始了一次关于扩大再生产的讨论，这次讨论由工学士马丁·舒伯工程师开头。舒伯试图用第二部类更加迅速增长的论点来证明新政策的持久性，这样必然就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倒置起来。他写道：

“即使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比第二部类较慢，而扩大再生产还是绝对可以进行的。但积累份额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相应地减少……”^③

舒伯试图用许多非常复杂的计算来证明他的理论，当

① 汉斯·海塞尔：“国民计划中的决算”，“科学问题讨论文集”，第11期，第14、15页。（带重点是我加的——弗·恩斯特）。

② 汉斯·海塞尔：“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的增长问题”，“经济科学”，1954年第6期，第643页。

③ 同上。

④ 马丁·舒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实用统计”1954年第8期，第115页，续稿和结论在第9期和第10期。

然他把这些計算只应用在两个生产循环上，而沒有考虑到，如果积累份額减少，这种扩大再生产可以进行多久。

赫伯特·沃尔夫在同一刊物上对舒伯提出了批評，虽然他对舒伯的錯誤論点进行了駁斥，但是这只是同一理論的一种新变体。沃尔夫把从扩大再生产引出的第一部类增长較快的必然性，一律称为是馬克思再生产理論的庸俗化。他認為在扩大范围的扩大再生产（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和提高强度的扩大再生产（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情况下）之間應該有所区别，他写道：

“这里，生产資料的生产比消費資料的生产增长較快的規律完全是以提高强度的扩大再生产为基础的。”^①

因此第二部类較快地增长是可能的，人們應該把扩大范围的扩大再生产处于从屬的地位！沃尔夫在他的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再一次明确地証实了这个論点，他認為，从扩大范围的扩大再生产的观点來說，第一部类必須較快地增长是荒謬的^②。不可思議的是，沃尔夫在二月份的一期中結束他的文章时，却作出了确切的結論，对于这个結論我也同意：

“第一部类較快地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共有的經濟規律。”^③

句点。完了！再也沒談到扩大范围的和提高强度的扩大再生产。难道这不是“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嗎？

讓我們从事情本身来看一下，这不用圖表和冗长的計

① 赫伯特·沃尔夫：“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理論的几个实际問題”“实用統計”，1954年第12期，第178頁，續文在1955年第1、2期。

② “实用統計”，1955年，第1期，第12頁。

③ 同上文，第2期，第29頁。

算就可以非常清楚地說明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指出，只有当第一部类的新产品大于第二部类的固定資本时，換句話說，即只有当生产資料的生产多于消費时扩大再生产才有可能。但生产資料只能在第一部类生产。而且第二部类只有当第一部类供給它必要的生产資料时，才有可能增长。否則就絕對沒有这种可能，因为第一部类不仅生产生产工具，而且也生产原料和輔助材料。但是沒有一个热烈主張第二部类优先增长的經濟学家提出过这个簡單的問題，如果第二部类不能从第一部类得到必需的补充的生产資料，第二部类如何能够增长呢。这个簡單問題簡直就沉沒在大量数字中了。沃尔夫打賭地說，如果在第一部类降低生产資料的积累份額，第二部类可以增长得更快。然而第二部类依賴生产資料能依賴多久？尤其是这种十足兒戏的說法对于我們的现实有什么用呢？

最后，这所指的并不是任何一个安乐国的扩大再生产，而是指正处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扩大再生产。我們在从事社会主义的建設，这一点只有在工業、农業和运输業中实行机械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达到。我們要實現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需要。面臨着这样的任务，如果把第二部类的优先增长說成是規律，这不是把我們的全部政策推翻了嗎？只有第一部类，只有重工業，只有机器制造業才能够給我們提供这种技术。除此以外，社会主义和改善消費是不可能想像的。

除了这些原則性的錯誤外，海塞尔、舒伯、沃尔夫还犯了一系列方法上的錯誤。他們在論文里用复杂的数字例子和

圖表作了過分的裝飾，他們想用這些數字和圖表來建立他們的觀點。而他們卻忘了：數字例子和圖表是絕對不能代替經濟分析的。經濟問題最後一定要牽涉到人們相互間的社會關係的。如果他們能從再生產理論的歷史中受到警戒，那就不會以圖表來玩弄戲法了。難道還不曾利用再生產圖表鬧出事來！圖崗·巴蘭諾夫斯基曾以圖表證明，消費是根本不起作用的。因此，即使可變資本減到只剩一個工人，而事情最後仍然繼續進行。羅莎·盧森堡與此相反，她用圖表“證明”積累剩餘價值通常只有在非資本主義的環境中才能實現。如果這個環境消滅了，資本主義就自動崩潰。奧托·包爾又用相反的圖表“證明”，即使考慮到馬克思所忽視的種種因素，一切仍然能夠良好地進行，人們只須要正確地編制圖表就行了。而亨利克·格羅斯曼把包爾的圖表耐心地作了進一步的推算，並得出了極詳細的結論，說資本家到第三十五年，就將沒有什麼可以消費的了，加之作為積累的剩餘價值也不夠了，因此資本主義必然崩潰。難道所有這些胡鬧還不夠，以至我們的一些經濟學家還要給它添上几顆珍珠嗎？只要他們注意到馬克思的見解，他們是很可以節省他們的臭汗的。馬克思寫道：

“圖表本身什麼也不能證明，這些圖表只能描繪過程，如果這個過程的各個因素已經在理論上被闡明了的話。”^①

海塞爾、舒伯等人方法上的第二個錯誤在於：他們企圖以圖表來規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再生產的具體條件，而沒有注意到，首先社會總產品並不是完成生產後才分配，而是在同一生產循環中分配和生產都在同時進行。因此就有可

① 馬克思：“資本論”德文版第二卷，第506頁。

能使总产品以实物的形态来生产，并和所提出的生产任务相适应。第二，他們忘了，各个生产部門从属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是有条件的。这一点只根据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产品的預定用途来加以确定。生产拖拉机的机器制造工業是屬於第一部类的，但是沒有多大困难就可以把它改建，用来生产小汽車，这样它就屬於第二部类了。这个事实說明比例的确能够有一定的机动性，而这点从来就不可能包括在圖表中的。

最后，在討論中完全忽略了馬克思在他的再生产圖表中所說的流通过程的条件，他早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已經闡明了他一部分的再生产理論。人們在考虑再生产理論时常常就把这个忘了。列宁也經常以市場理論或實現的理論，也就是从流通理論的观点来研究这些圖表的，而这些圖表就是屬於这些理論領域的。

上述討論中的最大缺点是它脫离了主要的問題。再生产的主要問題对于我們來說是在于，不断地提高积累和消費，也就是扩大国民收入。在这样的观察角度下，这些問題，如劳动生产率、節約、降低成本、利潤都成了扩大再生产的实际問題。

此外，这个討論忽略了我們是处在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这一事实，忽略了在我国参加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有各种不同的經濟形式的这一事实。因此我們的任务就不可能只是一般地使再生产一年一年地扩大，而必須实现这样的一种扩大再生产，即促使社会主义成份增强的扩大再生产。如果我們考察一下一九五四年的国民經济計划完成情况，我們就可以看出，工業生产同一年一九五三年相比已經有了提高；

中央直屬的國營工業提高了	8.2%
地方國營工業提高了	15.0%
合作社企業提高了	8%
私營工業企業提高了	18%

由此證明，一九五四年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擴大生產占有的百分比最大，而合作社工業企業擴大生產所占的百分比最低。我認為，這種情況和我們提出的目標是不相符合的。當然私營經濟在將來的年份中也將有增長。但是我們必須這樣進行工作，在一般地擴大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再生產時特別優先擴大社會主義成份中的再生產。此外，我們也必須更加擴大整個農業的生產，不僅指社會主義成份，而且也指個別農民。

社會主義成份中的優先積累首先應該是用經濟上的方法，在運用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下來達到的，這就要求改進社會主義的經濟領導方法。這些方法決定於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和自覺運用。在這方面工農國家的組織作用具有着極其重大的意義。國家的經濟機構對支配經濟規律的學習愈好，我國經濟活動的作用程度就愈大。工人階級對社會的領導體現為國家機關在經濟生活中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在過渡時期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在全部企業中以及各個企業中學會並不斷改善對國民經濟的領導。如果我們注意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目前的情況，我們應該肯定，在這一方面的確還存在許多缺點。正是在經濟領導方面，我們還犯了許多錯誤，因而有時就使企業中的工人遭到艱巨的考驗。然而，我們可以而且應該肯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工人階級已經證明了，他們是比資本家更懂得領導經濟的。我們已經結束了失業和危機等現象，我們建立了

令人贊嘆的工程，如斯大林鋼鐵聯合企業，卡爾貝的低熔礦爐，勞赫哈默爾大型煉焦爐和深海造船廠。我們也將更多地消滅今天在建設中妨礙着我們的這些缺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工人階級已經開始和知識份子緊密合作，掌握經濟規律，工人階級將要這樣地支配經濟規律，使新的社會制度一定勝利。

我們現在必須集中注意的社會主義經濟領導的最重要的方法是節約制度和經濟核算制，這種制度是建立在運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的。

我們在整個經濟中嚴格實行節約制度，當然這絲毫也不限制消費。而是相反，我們節約材料、工作時間和財力是為了實現支付最少的費用取得最大效用的原則。貫徹運用節約制度意味着生產的提高並從而使消費有可能得到提高。

實現節約制度的最重要的手段是經濟核算制。“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寫道：

“經濟核算是社會主義企業有計劃地管理經濟的方法，它要求用貨幣形式來較量生產消耗和生產成果，要求企業用本身的收入來抵償支出，並保證贏利。”^①

用貨幣形式來比較生產消耗和生產成果要求精確地計算消耗，即生產費用。保證贏利就要求為降低各個部分的成本而進行有步驟的鬥爭，這種鬥爭又是以對成本的精確了解為前提的。而精確計算的絕對前提是編制和使用精確的有技術根據的並且是先進的標準和其它的經濟指標。在這方面僅是機器使用標準、電能和材料消耗標準和工作定

^①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03頁。

額是不夠的。還必須在技術經濟的基礎上規定一般費用和流動基金的指標。在這方面我們剛畏畏縮縮地開始工作。有一個科學工作組對是否能夠在一九五五年給流動基金確定有經濟根據的標準日作了檢查。它所得到的結果是，沒有一個總管理機構是有為此所必需的企業資料的。既沒有主要材料，也沒有燃料和動力原料和其它輔助材料的有技術和經濟根據的消耗和儲備標準。確定未完成的生产所需的流動基金的資料同樣也很少。這些資料必須今後着手編制。而我們如果得不到經濟上的確適合的流動基金和經常費用的指標，成本計算就會有漏洞，沒有利用到的潛力就可能隱藏在這中間。標準以及一般技術經濟指標是經濟核算的核心。

在計算成本中也還有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們的經濟科學工作者應該加以研究。例如，海慕特·克里姆根據費用超過時負債的原則研究了費用分裂的問題。得出的結論是：

“在實施中，按費用把不負債的超過費用分出來，變成了其他部門的負擔，這是很成問題的，並且不論從工作觀點還是從理論的考慮出發都是不能加以提倡的。”[⊖]

應該承認，從工作觀點出發，這個事情是不簡單的，但是從理論觀點出發是不能同意克里姆的意見的，如果他根據他的論述而得出結論是，計算由於工作原因而產生的廢品負擔不管所有前面的生產階段，而是直接算在促成產生廢品的階段的帳上[⊗]。克里姆應該說“發現階段”而不應該說

⊖ 海慕特·克里姆：“社會主義工業企業中的費用和費用分析的問題”，
“經濟問題發言”，第16期，第35頁。

⊗ 同上文，第93頁。

“促成阶段”。这个發言的意見是，按克里姆的例子來說，有一塊鋼錠，在高質鋼軋軋工廠里被确定作为廢品了，但人們并不把它認為是煉鋼工人的廢品，而是把它归作高質鋼軋軋工人的廢品。煉鋼工人甚至还可能因为这个廢鋼錠而获得了奖励。这至少在理論上是很明显的了，这样的实际情况是違背了按勞分配的原則的，應該促使努力寻找另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苏联的經濟学家也在研究这个问题^①，这說明了，在这方面的确存在着問題，我們不應該由于“从工作”考虑而忽略了这个问题。

經濟核算制的目的是要使国营企業获得或提高利潤。利潤即企業的贏利，是由成本和銷售价格之間的差別中产生的。另一方面，材料等等的价格本身都是成本的一个构成部分。因此一种正确的价格政策对于达到真正的利潤是具有非常意义的。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的決議中要求，“整个价格的形成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此价格的决定必須建立在“运用先进的有技术根据的标准来精确計算成本的基础上”。根据这个決議應該逐漸地减少高額の价格补助，特别是基本原料的。这样，在一九五三年煤、焦炭和有色金屬的价格就提高了。在这时所实行的人民必需品价格的降低証明了这些价格的提高对于消費者沒有坏的影响。随着当时价格的变更，向着利用价值規律整頓我国的价格制度迈进了第一步。在冶金業中制止了价格上涨。这时就为迈开下一步和根据成本重新調整煉鐵工業的銷售价格創造了条件。当然提高基本原料

① 海慕特·克里姆：“社会主义工業企業中的費用和費用分析的問題”，“經濟問題發言”，第16期，第36頁。

价格以使价格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这只是一个一次性的措施。从而就为有关部门争取降低成本获得利润的实际斗争创造了条件，使以后降低价格有了可能。

价格在计划和發展社会主义生产，确定正确的比例以及确立我国国民經济的各个不同成份之間的关系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常的手段。在这方面实际情况也已經告訴我們，在規定价格时不充分注意价值規律，对于整个国民經济都会發生坏的影响。

例如由机器制造工業部一九五四年第三四一号命令規定提高价格妨碍了投資计划的实现，并且使价格政策陷于混乱。但是它却使有关的机器制造企业获得了不正当的超额利润。在其它的价格形成时必须防止，生产者能够通过自由地确定他們的产品价格而提高他們企业的利润，因为这是損害了其他人的利益而达到的提高利润。要使利润得到真正的提高，唯一的办法是争取降低成本。

目前在規定农产品价格时对于价值規律的注意是很不够的。采購价格常常低于成本，而收購价格却超过成本几倍。这些价格到目前为止还表现为提高农業生产，特别是畜产品的有效的杠杆。但是逐漸地出現了一些不平衡的情况，这种情况起着有害的影响。例如牛奶和猪肉的价格訂得很高，但是通过价格来鼓励饲养小牛、种植蔬菜及其它却很少。这对于生产重要的农产品起了阻碍的作用。

在其它的价格形成时应该准确地研究各类价格对国民經济的影响，比目前更多地利用价格来作为在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基础上按计划發展国民經济的經济杠杆，并努力达到在規定一切价格时尽可能充分利用价值規律。当然这不能說一切价格的規定都是符合于价值的，而是說适应

价值规律的基本作用。利用价值规律就可以精确地确定成本，而规定价格是以这个为根据而有计划地适应当时国民经济的任务进行的。

利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改进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领导方法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得到日益广泛的发展。从而保证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和不断地完善，并且经常改善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通过我们根据这样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工作，我们证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比较西德资本主义经济要优越，从而使得德国人民的伟大目标，即恢复德国的统一，使德国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独立和强盛的国家得以早日实现。

经济和思想

最后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在意识和思想的发展中反映出来。我们必须确定，思想意识的发展是落后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的，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在经济科学方面近年来是有某些改进的。的确，要克服脱离生活的、犹太法典家“理论”的倾向还早。然而我们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已经非常注意实际的问题了。我们在经济科学方面已经有了生气。前几年在我们共和国出版的大量经济科学著作证明了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出版社的“经济问题发言”彙编的出版。在这些主要是由比较年青的经济学家写的著作中，大部分是真实地研究了我們经济建设中的迫切问题的。在这些著作中，许

多作品的缺点只是在于，作者在許多不必要的情況下用了复杂的計算表格和圖表过分裝飾了他們的敘述。因而不仅使工人，而且也使大部分做实际工作的經濟工作人員不能閱讀这些著作，而使这些著作失去了作用。我一点也不想爭辯，政治經濟学的比較高級的数学是可以起巨大的輔助作用的，但是我們在研究理論的經濟問題時絕不應該忽略对于我們有关系的是我們的理論知識的实际适用性。这种适用性只有在实际工作者懂得了这些理論工作者的語言時才会产生，而且，如果这些今天很热心地在从事研究經濟問題的先进工人們也能够从我們的理論工作者的著作中得到益处的話，那末它将更为有效。

此外，近几年来还出版了“經濟科学”杂志，在这本杂志中研究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西德的許多經濟理論和实践的問題。最后，德国科学院已在柏林建立了經濟科学研究所，并且設立經濟科学部門作为經濟研究工作的中心。

經濟科学領域內最大的缺点仍然在于，沒有能成功地进行关于經濟理論和实践問題的广泛討論。的确，在这个領域內已經有了开端，但是我們沒有超过这些开端。在这方面进行这些討論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就如来比錫卡尔·馬克思大学关于劳动生产率的討論会，关于工業总产量的計算的討論或关于工資問題的討論所証明了的。但是这些討論大部分还是限于很狹的範圍，它們都中斷了，說得好点兒，它們都睡着了，沒有得到一个結果。討論經濟問題的討論会和其它會議舉行得也太少。因此我們必須大大改进我們这方面的工作。

也應該肯定，我們的經濟科学和經濟实践之間的关系要改善的地方还很多。我們在这方面經常用脫节代替了紧

密联系。理論家和实际工作者之間还没有活躍地交換意見，沒有真正的合作。我經常观察到，經濟工作者从理論工作者的著作中得到的知識很少，他們沒有注意这些理論著作，因此在他們的工作中也就不能利用它們。我只想举一个例子說明。在一九五三年出版了古尔特·台希曼的著作“国内貿易經濟学”。这本著作應該在我国商業机关的工作人员中掀起活躍的討論的，因为它为此提供了很多的原因。关于这个問題我問了我国商業机关中的許多領導者，但是这些人中大部分連这么一本著作已經出版了都不知道！也有这样一些例子，例如某些問題，如劳动生产率的測定問題，經濟科学工作者已經解决了，但是直到目前还没有由此得出实际的結論。我們必須想出办法，以使在經濟領域中的理論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之間达到更緊密的合作。最近在这方面出現了一些好的傾向，希望事情得到徹底的改进，因为我們的經濟工作者現在正开始努力研究“政治經濟学教科書”。

过渡时期的任务的解决当然不是經濟理論工作者一方面，也不是实际經濟工作者另一方面的事情。这是广大群众的事情。人民大众是社会主义經濟發展中的決定力量。只有通过他們的劳动才能完成計劃。在群众性竞赛中貫徹了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規律和節約制度，因而提高了利潤。在群众竞赛中克服了落后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我們这里常常从西方得到新的养料。然而这种克服不会是自动进行的。正因为客观上意識落后于存在，思想啓發工作和反对落后認識的思想斗争就更加必要。因此經濟科学宣傳在目前我們过渡时期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国营企業中的工人現在正渴望經濟科学的啓發。他們

在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第二十一次全體大會後成千成萬地轉向鑽研經濟問題。于是就發展了一種勞動的新形式，像國營企業中的經濟會議。一九五五年二月底德國統一社會黨卡爾·馬克思城國營摩杜爾工廠的黨組織舉行了第一個這樣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工人、技術人員和工程師對提高企業利潤的問題進行了討論。

在我國社會主義企業中又有了一種新的情況產生，特別是對經濟學家提出了高的要求。經濟學家目前最主要的是要通過廣泛地宣傳經濟科學知識來幫助促進群眾在經濟領域中的創造性活動。他們必須聯系到工人們所在的企業的具体情况，來說明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性質和作用。對於這一種工作來說，“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一本可靠的入門書。我們現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充分利用總結在這本教科書里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向群眾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過渡時期的具體任務，以及他們的企業中的具體任務在理論方面和實際方面講解清楚。經濟科學工作者通過在企業的宣傳工作，一定會使得他們自己的研究工作更加有效果，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會從我們的經濟工作的實踐中吸收更豐富、更深刻的知識。

我們永遠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並不是教條，而是我們行動的指南。我們與實際聯系得愈緊密，我們就會使科學同人民大眾的合作愈鞏固，我們將會更順利地解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過渡時期的任務。

